

陆安史志

2023年第3期
总第45期

临安史志

LinAn Historical Records

目录

·卷首·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 韩喜平 1

·史海钩沉·

浅谈五代吴越国钱氏王族和文人诗词的体育文化意义 陶初阳 3

南苕溪水名及水流的演变 王水法 8

扶西的乡愁 洪刚 13

吴越钱王与余杭马绰、吴公约的故事 陈冰兰 17

不尽往事 都付亭檐声里——昌化古亭系列(二) 朱仲平 19

·史志理论·

增强历史思维 在调查研究中用好地方志 邱然 易飞 23

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 汤敏 吕克军 25

谈谈如何推进部门志、行业志、乡镇街志、村社志的编纂工作——对萧山首轮修志工作的调查 金雄波 28

·天目骄子·

做党和人民的好战士 章为质 36

做人民的勤务员 高树德 47

主 办：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临安区地方志研究室

主 编：凌亦鹏

副 主 编：潘军伟 许月琴 刘金炎

责任编辑：庄雪君 姜 驰

编 辑：彭 铖 许锦光 李 湘

回忆与怀念章敦仪 53

·吴越走笔·

五八师傅方 芳 61

向故乡杨菊三 63

西湖的表情陈 一 66

清廉家风代代传应拥军 70

·工作动态·

《天目风俗谈》出版72

学思想 育新人 忆初心 强党性——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7月主题党日活动 ...73

封一:昌化南门弄

封二:区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封三:杭州,今夜如您所愿——写在2023·杭州亚运会开幕之际 俞海

封四:昌化竹编 俞海

刊名题字:俞灵君

地 址: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28号职工之家1号楼1808室

邮 编:311300

电 话:0571-63721571

邮 箱:65470965@qq.com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

韩喜平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扎根广袤中华大地，吸吮中华文明的文化养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淀丰富、底蕴厚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文化、制度等为周边国家所长期学习和模仿。但近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经过反复比较、反复推求，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同时清醒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

命实践相联系的”。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汲取养分，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比光明的前景。五千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坚韧和顽强，为中华民族克服深重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的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汲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传统理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汲取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汲取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把发展选举民主和发展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华民族独特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文明滋养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文明又更新古老文明，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赋予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新的生机和活力，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资料原载于《人民日报》2023年8月1日第9版）



浅谈五代吴越国钱氏王族和文人诗词的体育文化意义

陶初阳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词人柳永的一首《望海潮》，为世人描绘了一幅当时杭州城烟波浩淼、如诗如画的江南胜景。

后世史家普遍认为，杭州能从隋唐时期的浙西边陲城市一跃成为北宋时的“东南第一州”，离不开五代十国时期定都于此的吴越国，和以钱镠为代表的历代钱王的大力营建和经营。正如南宋王明清在《玉照新志》卷五所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

经济繁荣，方能文化兴盛。其文学发展，在五代十国中事实上也是较为兴盛的国家之一。由此，吴越国钱氏诸王留下了许多诗词作品，不少为《全唐诗》《全唐文》收录，历代吴越钱氏后裔、文人也多有歌颂钱王、缅怀历史、游园赏景之作亦甚多。本文以五

代吴越国钱氏王族、文人诗词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对当时吴越国宫廷和社会生活中对于游艺、体育类活动的描写，探讨吴越文化诗词的体育文化价值。

一、吴越文化诗词对体育类活动的描写

诗词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记录生活、表达政见、慨然抒怀的重要载体。目前可见的吴越国三世五王本人所作的存世代表性诗词(含残句)有40余首，同时期至两宋300年间吴越钱氏后裔存世的代表性诗词近30首。上述80余首诗词中，有部分内容记录、反映了当时吴越国宫廷和士大夫阶层的日常生活。经过阅读、分析和统计，这些诗词中涉及到的游艺、体育类活动大体有五大类，分别是：登高类、游园类、游猎类、斗智类、游戏类。初列表如下：

类别	主要活动	诗词举例
登高类	爬山、登楼、揽胜等	“满眼旌旗皆动色，千株橘柚尽含芳。锦袍分赐功臣后，因向龙山醉羽觞。”（钱镠《九日同群僚登高》）；“暮山重叠势崔嵬，溢目清光入酒杯。几处烧残红树短，一帆航尽碧波来。”（钱弘俶《登卧龙山偶成》）
游园类	赏花、踏青、游玩等	“秣华园里万株梅，含蕊经霜待雪催。莫讶玉颜无粉态，百花丛中我先开。”（钱镠《百花亭题梅二首》）；“忽有灵根彰瑞应，皆由和气感明祇。休言汉代芝房异，今日吾邦事更奇。”（钱镠《西园产芝》）
游猎类	纵马奔腾等	“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兕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钱镠《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斗智类	下棋、酒令等	“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钱）口耳王，圣明天子要钱塘（陶）。”（钱俶《吴越王与陶谷酒令》）；“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结冰花。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钱俶《宫中作汝帖》）
游戏类	滚轮、乐舞等	“乌衣巷里走双轮，正是家山二月春。明日湖平定归去，蓬莱还见谪仙人。”（钱𨮒《次韵穆父兄见寄》）；“我有嘉宾宴乍欢，画帘纹细凤双盘。影笼沼沚修篁密，声透笙歌羯鼓干。”（韩偓《再和》）

这些作品对游艺、体育类活动的描写，或借景抒怀，如“满眼旌旗皆动色，千株橘柚尽含芳。”（钱镠《九日同群僚登高》）；或悠闲自得，如“莫讶玉颜无粉态，百花丛中我先开。”（钱镠《百花亭题梅二首》）；或人间烟火，如“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钱）口耳

王，圣明天子要钱塘（陶）。”（钱俶《吴越王与陶谷酒令》）；或童真可爱，如“乌衣巷里走双轮，正是家山二月春。”（钱𨮒《次韵穆父兄见寄》），吴越国王族、士大夫阶层举办游艺、体育活动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成为今天研究当时体育活动的重要资料。

二、吴越文化诗词的体育文化意义

1. 文学意义

唐末五代社会的动荡、人口的减少、民生的凋敝、生产力的倒退,必然反映在体育运动等上层文化建筑层面。这一时期的体育类活动,已经少有唐代流行的蹴鞠、马球等大型体育活动的记载——唐代多位帝王本人就是打马球的高手,取而代之的是小范围的游艺、游戏等等小范围、小规模活动。它们有的是吴越国三世五王和文人笔下借景抒怀,感慨民生百姓之多艰;有的纵马奔腾,一展功成名就之快意……这些诗歌或慷慨雄壮,或清新豪放,文风朴实,优美细腻,让人不难读出一种意境、一种画面、一种思绪。在唐宋之间的文学之林中,这类诗词作品占有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

2. 史学意义

全面、详实的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而古代的文献资料,实际上很难明确地分为史学、文学或者其他学问,因此,很多文献资料实际上可以共用或者互相印证。特别是对于资料分散、缺少出土文物直接印证的体育历史文化而言,许多相关资料可以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找到痕迹。以上吴越文化诗词中涉及游艺、体育的内容,有的是作者本人亲身生活体验,比如“满眼

旌旗皆动色,千株橘柚尽含芳”,有的则是历史典故或者亲眼所见,如“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乌衣巷里走双轮,正是家山二月春”等。由此可见,诸如诗词等文学作品,为人们了解当时的宫廷游艺、体育类活动提供了依据,成为研究五代吴越国体育史的一项重要资料。

3. 民俗意义

乱世之中,人们最渴望的是内心的安定、片刻的自如和艺术的滋养。比如行酒令,今天看来似乎未免“粗俗”,但事实上某种活动的“格调”的高低与否,并不取决于活动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文化修养和彼时心境。“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口耳王,圣明天子要钱塘”的酒令今日读来,可谓饶有趣味。“影笼沼沚修篁密,声透笙歌羯鼓干”一句,证明当时的西域乐器(羯鼓)和与之相应的异域舞蹈已流入远离边疆的江浙沿海地区,从这个侧面可以了解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融已到了非常高的层次。种种游艺、体育类活动,不仅丰富了乱世之中人们的精神生活,强健了体魄,而且丰富了古代民俗文化内涵。

三、吴越文化诗词对当代体育的历史镜鉴

体育,作为一个外延较广的名词。可以根据不同的维度分为不同类次。

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在国别上,区别于西方体育;在形式上,也有别于西方以“竞技”为特点的近现代体育。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由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的肢体技能孕育发祥而来;经过积累提高而初具雏形。到了战国时期,逐步将体育活动理性化、概念化、社会化,使体育成为一种社会人文现象。所以,中国古代的体育有自身的特点和传统,突出表现,就是体育活动与人文社会、道德礼法紧密相关,却不太容易受场地、时间限制。

通过赏析五代吴越国时期的诗词中的相关内容,能带来对当代体育的思考和启迪。

1. 体育是人的生理本能

开展合乎自身、规范规律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改善和提升体质,这是普遍的共识。早在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一书就指出:“用其新,弃其陈,滕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当时人们就认为,生命运动是“气”的运行和代谢,提出了生命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的思想。钱缪虽然出身临安平民家庭,起于兵荒马乱的大争之世中,但最后以81岁高龄去世,在医药卫生条件远不比今日的一千多年前,这是极其高寿的年龄。这和他本人在长年征战练就的

一副强健的体魄——《武肃王遗训》中称“垂五十余年,身经数百战”,必然有着重要联系。因此,“生命在于运动”,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一条经过历史文化验证的规律。

2. 体育是人的情感需要

“健康”既包括身体健康,更包括心理健康。现代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对人的心理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身体运动会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引起大脑的愉悦。长期身处征战、动乱的环境,使得当时的人们无论身份高低,事实上都处于神经紧绷、阴郁低落的状态。通过游艺、登高、赏花、踏青等体育活动修养身心,便是一种便捷的自我治愈方式。因此,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心理健康、情绪情感上的需要,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在频频见诸青少年心理问题新闻媒体报道的当下,更应重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问题,切实保障他们足时、足量参加体育活动权利。

3. 体育是人的风貌展现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钱缪所处的五代有一段著名评价:“五代,乱世也,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吴越国情况稍好,国家内部少有动乱,但不可能完全脱离五代十国的大背景而独立存在。之所以今天还能读到《巡衣锦军制还乡歌》这

样的传世名篇,这就是生命的力量,体育活动的魅力。吴越国时期诗词中对于游艺、体育类活动的描写,是当时吴越国宫廷文化、社会文化的反映,也有五代十国时期那些在逆流中登上历史舞台人物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因此,体育、健康相关产业的发达,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在新时代,无论从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需要看,还是从推动产业迭代升级需要看,应大力推动体育健康产生的发展。

四、结语

吴越国本身地处江南繁盛之地、

文化荟萃之处。这一时期的诗词在五代各国中存世量不算最多,知名度也不算最高——至少不能与同时代的南唐和李昇、李璟、李煜“李氏词人三父子”相比。但是,得益于独特的江南地方文化和钱氏三世五王推动,诗词文化仍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些吴越文化诗词,研究的空间还很广阔,特别是其中体现的当时游艺、体育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挖掘和探索。

(作者为区委宣传部吴越文化研究室主任)



南苕溪水名及水流的演变

王水法

苕溪为浙北大流，有二源：东苕溪、西苕溪，以东苕溪为远为源。南苕溪又为东苕溪上游，今考于临目马尖岗发源。旧文献作发源于东天目山之南黑驴庵，以今太湖源镇南溪为源。南苕溪，今指临安至余杭境内瓶窑一段水，本文就其水名演变、水道变更作考述。

一、《山海经》之“苕水”非今之南苕溪。

水名称“苕”，今所见最早文献为成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的《山海经》，可见由来亘古。其载云：“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旧文献常用此材料以证天目山，当是。但又用以证临安境内水，则误。

天目山群峰杰峙，有东天目、西天目、龙王山、广苕山、千亩田等山峰，海拔均在1500米上下，“苕水出于其阴”，乃言出天目山脉以北，为今安吉县境内水，今名西苕溪。山之北曰阴。

其时，今南苕溪称何名，不见记载。

二、东汉末、三国至南北朝、唐有“临水（溪）”之名。

此论现尚未发现直接材料，但间接可证。有关“临水（溪）”材料笔者发现三条：

1. 东汉建安十六年（221）临安始置县名“临水县”。县名由来史书无载，从有关材料分析，疑县中之水名临水，县当以水名。

2. 三国时（吴年为222—280）余杭之北也曾设临水县，即今德清县。此临水县约设未久即废，以致材料未被重视。现代历史研究定论，德清县置县始于唐天授二年（691），名武源县。至景云二年（711）改名临溪县，天宝元年（742）改名德清。

康熙《德清县志》卷一“市亭山”载：“《吴兴记》云：德清在三国时名临水，后并入余杭，后又并入武康，后又改为临溪。”

《吴兴记》为南北朝宋（420—479）山谦之撰，据此可知三国至南北朝今德清曾二度置县，县名前为“临水”、后为“临溪”。唐天授二年乃是复置，景云二年，复用旧名“临溪县”。德清

与临安处同一水系,这个“临水县”、“临溪县”疑亦以水名临水(溪)而名县。而《元和郡县志》释名以临余不溪而名,与现《临安县地名志》一辙。疑非。

3.唐代仍有临水(溪)之名。隋朝临安县撤,唐武德七年(624)复置,仍名临水县。仅一年又撤。下游德清县于景云二年(711)改名临溪县。

据古籍所载,吴越国王钱镠诞生于临安县石镜乡临水里。临水里的地域当是以太庙山为中心的今之南苕溪、锦溪沿岸,钱镠出生是地功臣山,有婆留井遗迹。临水里之名,当是里中有水曰临水(溪),以水名里。可见今之南苕溪(或并锦溪)唐时仍有临水(溪)之名。

上述临水县、临溪县、临水里,推测均以水名临水而名。

三、至迟在南北朝前期水流浙江,有大溪之名。

《山海经》之“苕水”实与今南苕溪无关。至迟在南北朝前期,今南苕溪流出临安,经余杭,汇浙江,非“北流注于具区”。从上节材料德清、临安之水同名同系可知,德清之水(又名余不溪)亦当经余杭,汇浙江。

时有酈道元著《水经注》,载云:“浙江水: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此为原经文。酈道元注云:“浙江径县佐,合余干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

酈道元,卒于527年,《水经注》当成于520年前后。其为北方人,对南方水系作注间有所误,但去误取正,仍可为证。分析酈道元注文可知:

1.今之临安、德清水有“余干大溪”之名,“余干”之义,有文献以为“余杭”之误。笔者疑为“余不”之误。形近。后世简称大溪。此名始于何时不明,但直至明清时期仍在使用。

2.水属浙(渐)江水系,与出天目山(浮玉山)之阴的安吉、太湖水各系。

四、南北朝后期有冷溪或泠溪之名。

南宋《咸淳临安志》载有“苕溪”,其中云:“《輿地志》云:自县之西名冷溪,盖取清冷之意。乘舟至此轻若凌虚。”

史界认定,此《輿地志》为南北朝晚期顾野王著。该志已散佚,但他书引录颇多,今人顾恒一搜集整理成《輿地志辑注》,上条材料收于其中。

冷溪,又作泠溪。《輿地志辑注》另收录二条材料:

一出《洞霄图志》卷二:“苕溪,在余杭西亦名冷溪,溪两浚有琴、鹤、翁、姥四山,皆有居民在其下。”此四山皆在临安境,翁山、姥山即今公山、母山。

一出《方輿纪要》卷九十:“苕溪,在县西,一名冷溪。乘舟至此有御风冷然之意。”

上三条材料,文既有相同,又有相

异,可知并非原文,但有泠溪或冷溪之名当非谬。而“泠溪”又与“临溪”同音,两者不知是否有关?今南苕溪有支流名灵溪,也同音,也有关乎?待考。

三条材料条目皆作“苕溪”,此“苕溪”二字不知是否为《舆地志》原文?这至关重要。如是原文,则可知今之南苕溪其时已改道经德清、湖州,合西苕溪汇太湖,整水名苕溪。惜无从考证。

另大涤山有冷泉,《咸淳临安志》载云:“冷泉,在洞霄宫外半里路石罅间,水脉甚细,冬夏不绝,莹然若玉壶之贮沆瀣也。山行者掬饮毛骨悚然,炎月投以热物,至晚即冰结。”洞霄宫历史上曾属余杭县,大涤山所出之水为临安、余杭二县界。在这里提一下:冷(泠)溪之名是否与冷泉有关?待考。

五、唐代有了苕溪之名又有清(青)溪之名。今南苕溪改道汇太湖。

唐元和年间(806—820)成《元和郡县志》,该志临安、余杭条未述水系,湖州府乌程县条有霅溪。霅溪为湖州府城至太湖一段水名。

该志卷二十六载:“霅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东北流,至州南与余不溪水、苕溪水合流入于太湖。在州北三十五里。”

“苕溪”之名今可见直接记载始此。

从霅溪又名大溪可知,唐代临安大溪(今南苕溪)已改道经德清、湖州,汇太湖,全流大溪、苕溪二名并称。余不溪,为今东苕溪德清县境内一段水名,接南苕溪。

唐代於潜境内水也有“苕溪”之名。唐释灵一有诗《自青山诣於潜道中作呈元八处士》,中云“苕水滩行浅,潜州路渐深”。至宋犹然,苏轼诗《於潜女》云:“苕溪杨柳初飞絮”。可知唐宋时期天目山南北之水均有“苕水(溪)”之名。临安境内水自然也在列。

又有清溪(青溪?)之名。

现代《德清县地名志》“德清县名考”载:“德清县名由来,据《今县释名》(案:疑是《郡县释名》)记载:德清,唐置。余不溪流经城中,一名清溪。其水清澈,县取名焉”。

临安境内水也有青溪之名,临安文献未阐明始于何时,今指南苕溪浪口以西青云桥、东天目一带水,又名南溪(见下文)。旧也以青溪称南苕溪整水,后演变为新溪。

清溪、青溪,当是同名异写。唐时已有此名。

六、两宋时期有南苕溪、南溪之名。

两宋时期(960—1279)苕溪水道与今同。临安境内段水有苕溪、南苕

溪之名，又简称南溪。南溪之名，今也留存，但为支流名，太湖源镇浪口以西青云桥、南庄一带水，总称南溪。其时对苕溪之名有了释名，以夹岸多芦花，因名。

北宋早期《太平寰宇记》载：“乌程县：苕溪在县南五十步，大溪是也。西从浮玉山，东至兴国寺，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曰苕溪”。

苏轼《表忠观碑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此将临安境内水作苕溪之源。临安境内水大溪之名渐淡，而以苕溪之名著。

北宋於潜名释道潜有诗《同吴兴尉钱济明南溪泛舟》（见《参寥子诗集》卷四），此诗南溪当是在湖州一段，但也可能今之东苕溪整水又别名“南溪”。

秦观《葛宣德墓铭》云：“是时朝廷兴修二浙水利，议者谓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见《淮海集》卷三十三）。

《咸淳临安志》卷十七：“临安县水路：南苕溪发源于於潜天目山，东流入县四十五里。又东入余杭县界二十八里”。南苕溪之名较早的见此。其时东天目山、南庄一带当属于潜县。

同上，“南溪，在县西三里，阔四十丈。发源于於潜天目山，东入本县界四十五里，至县郭东南二里五十步，又东二十八里入余杭界”。此“县”言临

安县。

七、元明时期有新溪之名，大溪、南溪名仍用。

新溪之名元末明初文献已见。《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抟霄传：“徽、饶贼复自昱岭关寇於潜，行省乃假抟霄为参知政事，俾复提兵讨之。抟霄曰：‘必欲除去残暴，所不敢辞。若假以重爵，则不敢受’。即日引兵至临安新溪，是为入杭要路”。

新溪之名，疑由青溪演变。上游青云桥一段南溪又名青溪，其地有青岭、青岭（云）桥、青岭（云）镇，水由此名。今横溪昔设新溪渡，又名青溪渡。民国《杭州府志》卷二十七载：“新溪渡，一作青溪，在县西十二里。新溪即南溪之别名，有新溪渡为入杭要路。”引自《读史方輿纪要》。

新溪，作为水名仍存。大溪之名也仍在用，其名从《水经注》出现，直至民国，长达1400余年，实际使用可能更早，更久。

明万历程嘉燧《余杭至临安山水记》：“背溪行山间，至十锦亭、大溪桥，乃复逾溪，则已次临安。”大溪桥，即是长桥，跨南苕溪。

八、清代苕溪全流有东、南、西、北、中苕溪之名。大溪、新溪、南溪之名仍存。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二：“苕溪二源：一曰东苕，出天目山之阳，东

流经杭州府临安、余杭、钱塘县，又东北经湖州府德清县，为余不溪，北至湖州府城中谓之霅溪。一曰西苕溪，出天目山之阴。东北流经孝丰县，又北经安吉县，又东经长兴县，至湖州府城中两溪合流，由小梅、大钱两湖口入于太湖。”此有了东苕溪、西苕溪之名。

《明史》卷四十四：“临安，府西。西北有南溪，即东苕溪也。源出天目山，经县南，亦曰新溪。”《明史》成于清前期。

嘉庆《余杭县志》卷十：“自临安北折三川会达广度岭，转屈汇趋径山，诸水由戌岭流入双溪，南向曲折数十里直抵东北，出瓶窑接径山大港入大溪者，为北苕。由黄版溪、蛇皮岭转质库塘，过舟枕山北至长乐桥，绕观国山，越邵墓桥，左经仇山，右度新岭，又数十里亦出瓶窑而入于大溪者，为中苕。惟由临安县之锦溪，绕青山直注于县之大溪者，为南苕。”三川，即今安吉山川，旧属临安县。黄版溪，仇溪（中苕溪）经黄版（横版）镇一段称黄版溪。临安县之锦溪，此以锦溪概称临安境

内水，不当。

《清史稿》卷六十五：“东溪出大溪，即苕溪。”东溪，言东苕溪。《清史稿》成于民国前期。

从上知清前期浙北水系苕溪诸源已冠以东、西、南、北、中五方位字称名，一直沿袭至今。今大溪、清（青）溪、临水（溪）、冷（泠）溪之名已成历史；新溪，为季节性河流；南溪之名保留在一支源。

结论：

1.《山海经》之“苕水”，乃今西苕溪，与南苕溪无关。

2.自战国以降至南北朝前期，今南苕溪水流浙江。当在此后水改道流太湖，与西苕溪汇合。具体改流时间不明晰，但不会晚于唐中期。

3.水名使用最久者为“大溪”。唐时水道改汇太湖后，方以“苕溪”称之。宋代始有“南苕溪”之名，直至今被正式定名。曾别名有临水（溪）、青（清）溪、冷（泠）溪、南溪、新溪等。

（作者为临安文史爱好者）



扶西的乡愁

洪 刚

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家乡扶西，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承载着浓浓的乡愁记忆。

扶西之美，美在山水形胜。说起扶西，和於潜大有渊源。扶西在於潜南10里，天目溪穿村而过。天目山古称浮玉，雄踞黄山与东海之间，龙飞凤舞俯控吴越，狮蹲象立威镇东南。在天目山南麓，有千年古镇於潜。关于“潜”，公认说法是指潜山，相传尧时洪水泛滥，惟此山潜入水中，不没者百丈，故称潜山，即今龙岗百丈山。至秦时，“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暨”（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是境内最早见有文字记载的越语地名。关于“於”字，有两解：一说指盐，“越人谓盐曰余”（东汉《越绝书》），大概意思是暨地有盐，方便居民集中生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暨”；一说无义，如“於越”为越人发语词。今天东南一带的余杭、余姚、余暨（萧山古称）、余汗（今江西余干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县）、余发（今越南宁平东南，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

元前111年置九真郡辖县）等，都是古越语地名的汉语音译。旧“暨”无水，《后汉书·郡国志》始加“水”作“潜”，称於潜。

舟楫声渐远、文韵犹在耳。关于扶西地名，有据可考的说法是得之“浮溪”之谐音。关于浮溪，康熙十一年《於潜县志》有三段记载：“西溪南迳崖萼山，悬崖岖崎临水，为一县之胜境，后人名溪曰锦江，锦江又南流为浮溪。”“昔溪入于交溪，迳南山入于浮溪，浮溪又东南过扶西，迳烟口苦竹水注之。”“水出陈益坞，南流为双坑，合杨家坞水迳苦竹，合干岭乌凡水入于浮溪，浮溪又东迳牧亭竺岭之阴，诸水注之又西流为梅溪。”可见，浮溪大致即今天目溪下埠溪村以南、新梅村以北段。天目溪自於潜以南，溪流已趋于平缓，特别是到南山折而向东时，泥沙大量沉积，抬高河床形成了浅滩，溪水流过浮光跃金，“碧水浮金滩”，因名浮溪。又因得南山之佑，山南溪西之地由冲积地台渐渐变成了一片相对丰饶的沃土良田，

形成“清溪扶西垄”之势，浮溪之畔扶西村，溪因地形、村由溪名，与於潜潜山、浮溪两个地名一潜、一浮、一山一溪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於潜灵动的特质。

扶西之美，美在人文昌盛。於潜自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置县，为临安三县最早。同时地处横联杭徽、纵达宣婺的陆路交通要道中心，加上天目溪彼时水路畅通，钱塘航道可直达今天的下埠溪，商贸自古繁华，而扶西更因沿路沿溪的地利优势，商贾云集、人文昌盛。相传唐朝年间扶西村地处浙中到皖南的交通要道，沿溪筑村、通航便利，洪水来了，村落地形就会上升，房屋和庄稼不会被水淹没，因而得名“浮溪”。由于水旱不侵，村里渐渐繁衍集聚了上千户人家，因而得名“千家村”，其中夏家、赵家、曾家、潘家、张家六户是大姓。扶西村曾一度成为商贾云集之地，传说下雨天从村南夏地畝（今夏家）走到村北曾家油车（今老油车），相距2000米路程不需要打伞，靠一户户相连的店铺商家檐口瓦廊足以抵挡雨水。因此，一度有“小小於潜县、大大牧亭村，天目溪西千家村”的说法。牧亭之大，大在牧亭侯何腾，千家村之大，大在商业和文化的繁荣。

扶西文风昌盛，最为出名的是北

宋诗僧道潜（1043—1106），道潜本姓何，字参寥，赐号“妙总大师”。道潜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剃度为僧，内外典无所不读，能文章，尤喜诗。初与秦观友好，苏轼为杭州地方官时，道潜居住在智果精舍中，遇到苏轼，在坐赋诗，挥笔而就。苏轼甚爱之，此后二人交往甚笃，唱和往还，结为忘形之交。苏轼遭贬谪居黄州后，道潜不远千里相从，居留一年多时间，后复回於潜西菩山中。到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道潜也受牵连而治罪还俗，谪居山东兖州，建中靖国初年（1101），方受诏复还，仍削发为僧。崇宁三年（1104）赐号妙总大师，崇宁五年（1106）归老于江湖。

今日扶西还有三学寺自然村和三学寺庙遗址。苏轼任杭州通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期间，多次来於潜，也数次到过扶西村三学寺。於潜县志载《过三学寺访参寥子二首》：寓世身如梦，安闲日似年。败蒲翻覆卧，破衲再三连。劝客眠风竹，长斋饮石泉。回头万事错，自笑觉师贤。（其一）妙迹苦难寻，兹山见几层。乱峰螺髻出，绝涧阵云崩。措意元同画，观空欲问僧。莫教林下意，终老叹何曾。（其二）从佛教教义看，“三学”即学佛者必须修持的三种基本学业：一学用“戒”，止

恶修善；二学用“定”，息悬澄心；三学用“慧”，破惑证道。从历史看，三学寺也称学士“三”，即三位大学士到过扶西，除苏轼外，还有北宋晁补之（1053-1110），元丰二年（1079）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晁补之早年从父晁端友游宦杭州，携文谒苏轼，苏轼称其“於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深受嘉许。有《同柳戒之夜过三学院》诗为证：“步月寻溪过佛斋，溪边石藓湿芒鞋。虚堂共卧听松竹，半夜一山风雨来。”姚宗文，浙江慈溪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由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天启时依附魏忠贤，擢升都御史，官至吏部给事中。工书法，娟秀清逸。天启四年（1624）纂修《慈溪县志》16卷，是为现存最早的慈溪县志。有《赠三学寺心海藏主》诗为证：弥天道号昔鲁闻，七蒲威仪自不群。缙布衲衣方广袖，携来天目半溪云。可惜三学士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今日仅存孤独的庙基遗址，和没于典籍的一段佳话。

扶西之美，美在淳朴民风。历来扶西有上扶西和下扶西之分，上扶人来自青田，下扶人来自舟山。与此相关的，是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和鸦片战争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到1864年天京陷落，於潜作为湘军和太平军反复拉锯的前沿阵地，原住居民基本死伤殆尽。继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定海三总兵于1841年阵亡，舟山定海失守，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再度占领，作为控制长江入海口的舟山，人民已被逼得无法生活。而经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临安、於潜、宁国一线，也已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无主之地，在“上八府”填“下三府”的人口迁移大潮中，形成了今天扶西村以舟山、青田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儿时春天清晨的绒鹅、夏日雨后的蛛网、秋后的番薯面、冬日飘散着年糕花香的青石板祠堂，都带着浓郁的乡愁记忆。

扶西先民带着深重的历史灾难而来，带着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而劳作，大兴农桑、勤于耕织，至民国23年（1934），已成为全省16个蚕业改良区的重要基地。至我记事起的20世纪80年代，常听着长辈们一边在大礼堂为毛主席带领大家大兴农田水利发展集体经济好、还是邓小平分田到户好争论得面红耳赤，一边在“希望在田野上”高亢激越的大喇叭声中热火朝天的下地“双抢”，我们下扶西成立了全乡最早的乡镇企业——堰口砖瓦厂，并在80

年代中期相继办起了电风扇网罩厂、织袜厂等，一时间上海师傅、义乌师傅、东阳师傅和四里八村的工人云集在一个小村子里，因1969年“7·5”洪水被迫搬到半山腰的学校又建设一新搬回到村里了，幼儿园也全新亮相了，自来水接通了，大礼堂放上了大彩电，冒着汽油清香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掀起阵阵尘土，也给了我一个喧嚣快乐的童年。我们听着老师讲“社会主义好，吃得油、穿得绸，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上山下地勤工俭学，捡稻穗、采茶叶，学雷锋拾金不昧，做颗粒归公的好孩子。大人们向往着当万元户的披红挂彩，梦想着不断升级的“三大件”，到

处洋溢着创业的激情。

今日的扶西，多了老人，少了孩子，变得安静。春日，西山的杜鹃蔷薇花团锦簇，田野油菜一沐春风万顷黄，映带斜阳金满眼，绿得油亮的溪水掩映而过。夏至，西山层峦耸翠，田野青纱挽妆，溪流放歌欢唱。秋天，山中红叶漫漫，稻田一片金黄，溪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季，银装素裹，红联白墙，老人坐在墙根讲过去的故事。岁月无声，我们已从孩提进入中年，在传承中走来、在岁月中老去，梦萦魂牵、念兹在兹还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作者为临安区委巡察办主任）



吴越钱王与余杭马绰、吴公约的故事

陈冰兰

临安、余杭山水相依、阡陌相连，人文历史相融、交集，至今仍有许多故事流传。五代吴越国时期，余杭人马绰、吴公约辅助钱镠，成为钱镠的左膀右臂。

马绰出生于唐大中六年(852)，与钱镠同在石镜镇将董昌营下。有一次，董昌命钱镠检视部伍，因花名册遗失，钱镠凭记忆一一唱，且对部卒存亡健病等情况毫无遗漏。马绰悄悄告诫钱镠：“他(指董昌)忌猜心很重，若知道你如此精敏而亲近部属，必定会加害于你。”马绰便拿了几张空白花名册给钱镠，让他佯装按册点名以作掩饰，钱镠十分感激。

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僭称皇帝，立国号为“大越罗平”，改年号为“顺天”。马绰时任越州(今绍兴)都指挥使，随董昌驻于越州。马绰闻讯董昌阴谋，弃家投奔钱镠，后又随钱镠征讨董昌，并在钱镠麾下任诸城都指挥使，讨伐平定董昌。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将领徐绾与许再思密谋兵变，合力攻打杭州城，马绰和内城指挥使王荣、钱镠之子钱元瑛等顽强抵

抗，在成及、杜建徽、高彦等原八都将领的支援下，平息了这场危及钱镠大业的叛乱。

马绰历任两浙行军司马、睦州刺史、秦州雄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加同平章事。马绰为钱镠赴汤蹈火，钱镠钦佩马绰的智勇才能，两人结为生死之交。钱镠将堂妹嫁给了马绰，后来又命儿子元瓘纳马绰之女为妃，称恭顺夫人，钱、马两家结为世代姻亲。贞明七年(921)八月马绰去世，享年71岁。

吴公约是县里的富豪，出生年不详。唐末黄巢起事，杭州一带建立八都武装抗击黄巢军，后来朝廷增置都额，扩为十三都，吴公约率领其中一都。朱直起兵时，吴公约应募西征，他精通兵略，勇敢、有胆识，立下不少战功，被任为西植镇遏使，后从董昌御黄巢西鄙，加以御史中丞，改以海宁硖石为训兵之所。钱镠在平定越州(今绍兴)时，吴公约骁勇善战，受到钱镠赏识，战事结束后吴公约升任千牛卫将军、肃政队长。光启三年(887)，镇海军将刘浩发动兵变，吴公约参与讨平，以功授散骑常侍。光启四年(888)，钱

缪讨伐苏州,以吴公约为北面诸军行营招讨使,攻克苏州后,吴公约率本部回师,钱缪嘉其忠勇,吴公约谦让军功。从此钱缪更欣赏他的忠心亮节,兼授其义和镇遏使、本军水陆游奕使。这年冬天淮寇南扰,吴公约联合诸军,捍御疆域,屡败淮军,升工部尚书,不久改任刑、户部尚书。吴公约清廉淡欲,缴获的军事物资,统统分给部属,为将数十年,家无长物。他身为将领,在外督励将士,在家则训诲子弟,清廉自守,不积私财。唐乾宁四年(897)三月,吴公约去世。

在清康熙《余杭县志》中,马绰和吴公约都有记载,这两位战将在钱缪缔造吴越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余杭

有马家弄、吴家弄两条古弄,我猜想这两条古弄与马绰、吴公约应该是有渊源的吧。

吴越国的都城在杭州,钱缪在余杭建立清平军城,余杭既是京畿之地又是兵防重镇,钱缪在余杭留下过很深的足迹,他建造的安乐塔,成为余杭古县城的地标性建筑;他重建安镇桥(今通济桥),使得余杭这座东汉古桥得以延续;他修建千秋堰,为余杭治理水患,余杭也因为钱缪而提高了知名度。安乐塔和通济桥至今仍在,就像茗溪水,流淌着的都是故事。

(作者为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散文学会会员)



不尽往事 都付亭檐声里

——昌化古亭系列(二)

朱仲平

高义声传还金亭

清凉峰镇白果村乾山自然村横溪桥头有座还金亭,亭柱有今人撰写的联语:“候主还金钦美德,置亭布景仰高峰。”“还金德高,芳名留百世;建亭义重,古迹永长存。”此亭是康熙乾隆时期为当地秀才王之臣拾金不昧而建。

民国《昌化县志》载:“王之臣,字仰峰,邑庠生,家贫,素以狷介闻。偶憩于亭,旁遗一囊,拾而启之,兼金三百也。之臣俟于亭者三日,忽一人张皇而至,叩之,即遗金者,诘其数,悉与所拾符,乃取囊归之。客欲以半为酬,固却之不受。”该人遂在横溪桥边建“还金亭”。

据民国《昌化县志》赋役篇载,清早中期,昌化县一年应完赋税9800余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可购买150斤优质米,三百两白银可买45000斤大米,足够五口之家二十四年的口粮。有了这个直观参照可以认识到,当时对昌化地区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三百两白银都是一笔巨款,王之臣可谓人

中君子。

乾山村还金亭初为砖木结构的跨路亭,占地200多平方米,悬有“留金著身”牌匾。据乾山村《唐昌王氏家谱》记载,旧时亭内有长条凳,夏则施茶水。还金亭历经毁建,约民国早期改建路旁。江苏宜兴人许之象于民国十四年(1925)任昌化知事,到任不久,他就在还金亭旁竖碑谕示保护,并书楹联:“还金德高,芳名不灭;建亭义重,古绩长存。”

1959年前后修白果至石瑞的公路时,还金亭被拆除,村人就其址建成一神庙,镶还金亭记事石碑七通于壁。后留宿其中的乞丐不慎失火烧毁神庙,基址一度沦为村人堆放杂物、泥灰之所。2007年6月,临安市文物馆和大明山旅游公司将周边辟为小公园,并重建还金亭,遗存石碑整理成碑林。

财富是生活质量的基础,但不应是生活的目标。赚钱的能力和支配财富的能力同样重要。但是古往今来,贪财好利、自私自利者如过江之鲫、原上之草。《好了歌》云:“世人都晓神仙

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可见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经验教训并非易事。

以此观之,庠生王之臣的品格,如他的字一样,是一座需要仰望的山峰。

千古佳话东坡亭

昌化民众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官员乡绅,对苏东坡都有特殊的情感。自北宋宣和间以来,东坡学士就列祀县儒学三贤祠中,境内还有专门的苏公祠(又名苏文忠公祠)。

苏轼自登进士,诗文即名闻海内。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的他巡行属邑至昌化,在查看灾情之余,为烹好茶曾四处寻找清泉。曾自双溪馆(驿站)下步寻溪源至武隆山治平寺(今塘湾里),留下《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诗二首,爱寺后幽邃,遂构亭憩焉,手书“东坡林”三字,石刻于亭,并于山下凿双池,种红白莲花。又循双溪而上数百步(今东坡廊桥北),有水洼甘洁,乃穷溪源寻之,得窍中泉清冷异常,酌以试茶。苏轼在昌期间的轨迹已难考证清楚。据苏辙、道潜、维琳等人诗作推测,可能到过千顷山、大明山。

苏轼离开后,昌化地方官和读书人纷纷寻踪其登临之地,或题字咏诗,或建亭纪念。宣和中,钱冰建三贤祠,以许迈、罗隐、苏轼为三贤,其在治平

寺后所构亭子被命名为“东坡亭”,红白莲池被命名为“东坡池”。而试茶之处凿石为泓,刻“东坡泉”三字于石。开禧二年(1206),昌化令章伯奋作小亭于东坡泉左,名曰“荐菊”,取东坡诗“一盏寒泉荐秋菊”之意。开禧三年(1207),章伯奋于双溪亭(又名合溪亭)南岸中洲上建芳洲亭,其左建倦飞亭,取东坡诗“倦飞不拟控扶摇”之义。芳洲亭右建芎笋亭,取东坡诗“溪笋瘦、野芎苗”之义。其后有人在象贤庵上数十步建亭纪念,名寻源亭。

围绕这些泉石亭台,历代文人留下非常多的诗词文赋。宋代黄寿有《重修双溪驿馆记》,章伯奋有《合溪亭记》,明清则有傅佩、魏墀分别作的《重建东坡亭记》,罗朝彦有《改建苏文忠公祠记》,章勛作《东坡亭赋》。至于题咏,仅以和东坡原韵为题的就有二十余首,其他长短律诗、绝句更是不胜枚举。昌化人文初兴于南宋览川章樵家族,而发端启绪,东坡学士功莫大焉。

在明代,汪栋、马逢伯、陶钦中、华文甫、方震仲等知县六次重建或是整修东坡亭。清顺治十年(1653),邑令魏墀重建该亭时,于其旁增建景苏亭。康熙六年(1667)和康熙十七年(1678),邑令刘宗向、涂铨接续再修。

改革开放初,东坡亭和倦飞亭等遗迹均已不存。1985年,昌化镇筹建南屏山公园,时任昌化镇委书记、工程

负责人郑志荣非常重视东坡文化遗存的保护,在反复征求社会意见后,在南塔岭北坡重建东坡亭、倦飞亭,又新建环翠亭。如今从东坡亭俯瞰,整修后的昌化溪(即双溪)“派分则玉虬怒奔,涛鼓则素练阔曳,晓烟忽开,夕霖乍合,瓠鹭飞翔,鱼钓上下。”“供一日之眺望,助四时之吟赏,舒无穷之景,涵不尽之意。”(均出黄寿《重修双溪驿馆记》)

令人欣喜的是,乡贤陈经建捐资修成“东坡廊桥”,唐昌古镇得以平添人文胜境。但见长虹卧波,高阁巍峨,廊柱之上,名家联语琳琅隽永,桥南墙刻何贤寿老师的《东坡桥赋》,文辞之瑰丽,书法之秀劲,镌刻之精美,可谓三绝。

东坡桥作为学士遗迹,为昌化延续了千年文坛佳话。

烽烟熏染会师亭

童千公路距浙西天池4.5公里处的观景台上,有座水泥方柱、木质横圭顶的会师亭。该亭原在雨头湾,解放前是苏浙皖边区的地下交通站。1949年4月,裘正发动昌化起义后,带领县自卫大队人员与皖南游击队、孝丰游击大队于此会师。因年久失修,浙西天池景区开发后,景区管委会重修该亭,命名为“会师亭”。后该亭四周翠竹生发,渐至淹没难行,2016年整修童

千公路时,为方便游客缅怀先烈,昌化公路段将会师亭搬迁至此并予重建。

裘正又名裘振纲,曾用化名周平、慧文、惠民、伯纪等,祖籍嵊县。其父亲裘绍、母亲尹维峻是辛亥革命先驱。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裘绍、尹维峻曾在革命党人光复杭州时任敢死队队长,在攻打巡抚府、藩府等目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9年和1920年,尹维峻、裘绍相继为革命献身。

裘正由其姨妈尹锐志(著名辛亥女杰,与其妹尹维峻均为秋瑾学生)抚养成人。裘正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初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3年春在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工作,不久调任苏北行政学院教育长。因肺病赴浙沪治疗,病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在重庆找到董必武。受到董必武指派,1946年赴杭敦促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1948年8月,被陈仪任命为昌化县长。裘正到任后,即撤换县政府人员,改编县自卫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指派秘书王野耕与中共苏浙皖边区取得取得联络,主动接受组织对起义的领导。1949年2月,为培养骨干力量,以县青年政工队名义在昌化镇西街戴家祠堂开办干训班。4月9日傍晚,裘正接到其姨夫周亚卫(时任国民党陆军中将、浙江省顾问)密电,得知起义谋划泄露,遂率县自卫队大部于次日提前起义。4月11日,裘正部与苏皖浙边区

书记钱敏所率的皖南游击队在桃花溪雨头湾凉亭会合后,次日被改编为苏皖浙浙西支队,裘正任支队司令员兼浙西办事处主任。

在裘正率起义部队向昌北山区进发时,其秘书王野耕、警卫姚世虎、县政府秘书张武三人按计划去带领干训班学员转移,被省保安队包围在戴家祠堂,围困两个多星期后,王野耕、姚世虎、张武三人被捕,后转移至杭州监狱。渡江战役胜利之际,被反动派杀害在六和塔下。

昌化起义极大振奋了敌后革命信心,吹响了浙西解放的序章。昌化解放前后,牺牲的还有多人。5月1日,浙西支队击溃敌军,攻入昌化县城。章敦信与其他干训班学员加入了浙西支队,参加之后清剿国民党残部的战斗。5月12日,在大地里黄泥岭与国民党整编第52旅残部的遭遇战中不幸中弹牺牲。5月26日,原二野12第36师106团2营排长钱向钧,在河桥玉屏

山与国民党整编第52旅残部激战中牺牲。桐乡一中离休老师周易在昌化起义前担任裘正与苏皖浙边区联络员,他父亲周秩宗于7月31日被残匪李去非团伙杀害于龙岗。

裘正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1983年,离休的他曾重访桃花溪会师处。

2000年,已离休的周易回到昌化重游故地,目睹老区变化,感慨万千,写下《访桃花溪》诗:

又见桃花夹岸开,烽烟散尽我重来。村前喜见新篁秀,劫后难寻废垒灰。

车马于今喧鸟道,楼台到处起蒿莱。故人无恙新人好,共话沧桑忆旧醅。

千顷山会师亭,是昌化地区革命烽烟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濰口镇迎丰村人,现为山东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一级警长)



增强历史思维 在调查研究中用好地方志

邱 然 易 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文献调研法。文献调研法就是围绕特定的调研主题与问题，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调研目的。在文献资料中，地方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功能，能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下去，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具有资治功能，能为领导干部和决策机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有细读地方志的习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指出：“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

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每到一地调研，都会让当地准备县志，往往翻阅至后半夜，第二天与大家交流座谈也经常以县志里的内容为话头。习近平同志履新上海不久，就让市委办公厅找相关部门给他提供一套上海地方志。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要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并且举了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例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决定还提出了不少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个别口头询问，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等。这些要求和办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挥好地方志作用提供了重要遵循。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参考历史信

息。调查研究旨在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通过正确决策真正把问题解决好。作出正确决策,既需要加强现实研究,也需要参考历史信息。充分发挥地方志的作用,增强历史思维做调查研究,不仅可以看到“现在”,还能参照“从前”,更能以史为鉴决策“未来”。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汲取治理智慧。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记录前人处理政事的得失,兴亡成败尽在其中。在调查研究中,将下沉一线时看到的听到的,与地方志记录的先贤治理地方的智慧和经验结合起来,有利于领导干部“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正确地指导工作,不断提高解决问题

的实效。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提升自身修养。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时阅读地方志,除了能对当地流传史册的历史名人、民俗民风有更深刻的了解,还能对标先贤涵养品格。阅读地方志能让我们明白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官才会永存史册,才会让老百姓念念不忘。要以地方志中的先进人物为楷模、以反面典型为鉴戒,不断提升自我修养。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资料原载于《人民日报》2023年8月8日9版)



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

汤 敏 吕克军

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村志是以村为单位,全面记述其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述,是别具特色的记述体裁,生动体现了乡村发展历史和村落文化内涵。近年来村志编纂呈蓬勃发展趋势,在有些省份,甚至掀起了“村村修志”的热潮,可谓是新时期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且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历史悠久 于今独盛

村志编纂具有悠久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正式意义上的村志是郎遂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编纂的《杏花村志》,这是为安徽池州境内一个村落编修的志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村庄衰败,村志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使乡村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真正成为乡村的主人。1958年,在全国范围部署编撰“四史”,一些地区的村志开始编纂,但这一时期的村志普遍在篇目、内容、表述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性和局限性。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村志

编纂兴起。20世纪80年代,《山城子村志》《常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编纂、出版;90年代,村志编纂持续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跨越提升;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村志编纂发展迅猛,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指导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庄(社区)编修地方志”,并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总之,村志编纂覆盖面日益扩大,质量、体例日趋成熟,从个体的自发编纂发展到地方志工作部门领导、学者参与、村民编纂相结合,乡村文化传承意义愈发明显,村志编纂已成为当今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体现了广泛的文化自觉。

多重价值 一志全彰

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在经济价值方面,村志对乡村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做了详细记载。如江苏省的多部村志对乡村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

型发展及当代经济形态做了重点记述,体现了多样化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例证了“只要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农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我们就不愁发展空间”的论断。在生态价值方面,村志普遍对自然环境、生态做了翔实记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在“天人”篇中,对该村的地形、气候、水源、河流、动植物进行了记述,从而导出村庄道路不使用水泥建设而就地取材于河流冲刷形成的鹅卵石铺就,特殊气候环境下的天然水源及避暑养生胜地,以及迎客松、大枫树和花园式村庄形态的形成等。描绘了一幅幅“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面。在社会价值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村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北京市多部村志对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做了丰富记述,总结了乡村“良治”经验;广东省的一些村志中不但精选了城镇化转型阶段社会治理的典型事例,也留存着传统乡村治理经验,如广州市《珠村村志》对传统社会中的“联会”和父老乡绅议事制度的记载,体现了古今之间村域善治的绍继有方。在文化价值方面,村志可谓重笔书写。翻开每一部村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无论

是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还是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抑或是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都令人产生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与传承之志。如今,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村志所蕴含的“乡村价值”日益彰显,它在促进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优美村落景观形成、传统农耕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留住根脉 启迪将来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在社会急速变迁、乡村大量消失的今天,村志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像,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其一,助力乡村文化研究。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发展,村志编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体例,融裁内涵,提炼特色,量大质优,积累了大量文献,是记述新时期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本,与村史馆、文化礼堂等形成一体同构的立体面相。同时,众多研究者对村志进行辨章学术,从其传统共性、体例规范、资源开发、价值意义,以及在乡

村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显示出以“学术公器”进行文化传承的深刻内涵。其二,赋能乡村文化治理。村志是地方政府、地方志部门、村民、乡贤等地方文化主体的在地编纂,是村庄全体广泛参与的文化“盛宴”。如《柯桥区村志丛书》“序”所言,村志“最有人气。这一个村庄、数个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关心”。与“一统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省、市、县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政治凝聚力”不同,村志编纂,使得普通人不但得以“躬逢其盛”,且还能在志书中留下名字与事迹,从而产生亲切的文化认同感。村志记载村民嘉言懿行、善事义举,形成一个巨大且形象的道德舆论场域。这些对基层文化善治,塑造乡村振兴主角,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作用不可低估。其三,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乡村是中国人世代繁衍生息地、文化生长发展地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涵养传承地,村志编纂与中华农耕文化内在贯通并具当代适用性。近代以来,一些思潮简单地把农耕文化作为

愚昧落后的“前现代文化”的代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应做辨析和反思。村志编纂用全新视角重审重估乡村文化价值,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真实具体、生动可感的乡土社会,赋予了涵养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熔铸缔造现代乡村特色文化的意义。

根据冯骥才先生的研究,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了约90万个。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村志编纂更显得时不我待。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村志编纂在实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留住中华民族的根本宗旨和内在理路,构建了国家—人民良好互动的宏大文化体系等方面,其作用、价值及意义不可忽视。当今,方志界和学界对村志已建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村志编纂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夯实自身学科根基和文化特质基础上,与其他相关学科形成良好互动,着力提升编纂水平,体现凝聚乡村文化内涵和民众集体气质的地方文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方特有记述体系和话语体系。

(作者:汤敏、吕克军,分别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料原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8月19日第11版)

谈谈如何推进 部门志、行业志、乡镇街志、村社志的编纂工作

——对萧山首轮修志工作的调查

金雄波

摘要: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22〕5号)精神,对萧山首轮修志工作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行业志、部门志和镇志、村志与《萧山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事半功倍。三轮修志在即,行业志、部门志和镇志、村志可以与县级地方志书同步编纂,以推进行业志、部门志、镇志、村志的编纂工作。

关键词:推进 修志 编纂

1981年12月5日,随着中共萧山县委120号文件《关于转发〈萧山县志编纂规划〉的通知》的下发,萧山县首轮修志工作启动。1982年5月30日,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分志编写人员会议,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镇全面展开编写分志和镇志的工作。县志总纂完成后,萧山县委要求

“继续编写专志和专题史料”并出版或编印部门志、行业志、镇志。《萧山县志》出版后,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至2002年止,完成编纂的行业志(部门志)37部、镇志12部、村志8部和企业事业单位志8部,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城厢、临浦、瓜沥三镇基本完成编写地方志书工作。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22〕5号)精神,“鼓励和支持部门编纂部门志、行业志,发挥志书在部门、行业发展中的存史资政作用,扩大部门志、行业志编纂覆盖面。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组织编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鼓励引导经济强镇(街道)、村(社区)率先开展编纂工作。”对萧山首轮修志工作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部门志、行业志和镇志、村志与《萧山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事半功倍。三轮修志在即,部门志、行

业志和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可以与县级地方志书同步编纂,以推进部门志、行业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的编纂工作。

一、统一各级领导和编写人员思想,提高修志重要性认识,齐心协力修志

编纂《萧山县志》的同时,编纂部门志、行业志、镇志,中共萧山县委重视提高人们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和编写人员对编纂志书重要性的认识,齐心协力修志。

(一)统一县级领导思想

为了使编纂《萧山县志》工作能顺利开展,首先统一县级领导层思想,以期得到领导层对修志工作的重视。萧山首轮修志期间,主要通过各种会议,统一县级领导层对编纂《萧山县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1. 萧山县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常委会议,决定开展编纂《萧山县志》工作。参加会议的常委们共同认为:编纂《萧山县志》是一项维护一个县的历史真实面貌,为今后工作借鉴、建设指导、科学研究、历史查考,也为后世保存史料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编纂《萧山县志》任务繁重,条件有利,必须加强领导,组织力量,制订规划,依靠群众,一定要认真编纂好《萧山县志》。会议并讨论决定:成立萧山县志编纂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同时,还决定在财政比较紧的情况下,紧缩行政经费,编纂《萧山县志》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予以支付。

2. 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会议由县编纂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两个小组的成员参加。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列席会议。着重讨论《萧山县党史资料征集规划》《萧山县志编纂规划》并审议《萧山县志编修纲目》等。会议提出,要抓好两件大事:一是领导重视,调配人员,充实县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力量;二是发动群众,把编写分志和镇志的任务,落实到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镇。

3. 召开县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到会全体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县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员的负责同志,听取了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关于为什么要编纂《萧山县志》和《萧山县志编纂规划》的情况汇报,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编纂《萧山县志》,编纂新的地方志书,这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县委对编纂《萧山县志》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到会委员们共同认识到,“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千秋大业,同心协力”。委员们一致拥护县委的决定,一致赞同《萧山

县志编纂规划》。

4. 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为搞好编纂《萧山县志》工作,县编纂领导小组讨论决定:(1)召开一次分志编写人员会议,对编写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编写人员的认识,树立光荣感、责任感,重点解决如何编写分志的问题。(2)实行稿件计酬。(3)聘请顾问。

5. 县级领导出席县志编纂工作会议。(1)县委常委、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席中共萧山县委召开的首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2)县委、县政府、人大常委会、县政协的领导同志出席第二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3)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和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两个小组成员参加第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

(二)统一部门领导和编写人员思想

为承担分志和镇志编写任务的单位能紧跟编纂县志进度,并确保志稿质量,顺利完成《萧山县志编纂规划》提出的编写任务,中共萧山县委分别在编纂县志启动阶段、搜集资料编写分志阶段和县志总纂阶段先后召开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均有单位主管编志的领导同志和编写人员参加,统一部门领导和

编写人员思想,进一步提高他们对编纂县志的认识,使大家全力以赴投入编纂县志和行业志、部门志、镇志工作。

1. 中共萧山县委召开县志编纂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对编史修志的认识,动员各部门建立修志班子,广泛征集资料。出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城厢、临浦、瓜沥三镇,以及有关单位主管编志的领导同志和编写人员,共100多人。卫生局、农业局党组和临浦镇介绍了贯彻县委文件,着手编写分志,筹备镇志情况和下一步打算。会议充满着“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千秋大业同心干”的热烈气氛,给到会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县志编纂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与会者对编纂志书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编写分志的任务更加明确、组织领导和编写力量更加落实。大家反映,这次会议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起到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增强了信心和决定,原来行动快的单位表示要再接再厉,一抓到底;行动比较迟的单位,表示要虚心学习,加快步伐。

2. 中共萧山县委召开第二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城厢、临浦、瓜沥三镇的分管领导及全体修志人员等,共150多人。会上,县委常委、县人

大常委会代表县委作了《坚韧不拔,加倍努力,开创县志编修工作的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县农业、卫生、粮食三个局的编写组,联合发出了加快修志步伐,提高修志质量的倡议。6位分管领导和编写组人员在会上分别交流了认真做好编史修志工作的经验及试写志稿的体会等。许多同志表示,一定要树立坚持负责到底的决心,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编修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萧山新县志而积极贡献力量。

3. 中共萧山县委召开第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县志总纂的攻坚战,组织力量,完成县志总纂的任务。参加会议的有: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城厢、临浦、瓜沥三镇的分管领导及全体修志人员,共220余人。会上,县委副书记代表县委作了《集中兵力,抓住战机,认真做好县志总纂的攻坚战》的重要讲话。县财政志、县民政志、粮食志和城厢镇志的编写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介绍了善始善终做好编史修志工作,积极为县志总纂出力和热心修志、献身事业的先进事迹。大家认为实现县志总纂的目标,任务艰巨,条件具备,有信心,有决心。

二、广泛宣传发动干部群众,形成全社会参与修志氛围

萧山首轮修志期间,通过各种形

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形成全社会参与修志氛围,全县上下齐心合力修志。

(一)通过会议宣传发动

编纂《萧山县志》期间,通过会议,向不同层次的干部群众宣传编纂《萧山县志》的重要性,编纂《萧山县志》既是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工程浩大,任务艰巨,中共萧山县委已下决心,要化工本,把《萧山县志》编纂好。先后召开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县志编纂领导小组会、分志编写人员会、县志编写人员座谈会、资料工作座谈会,每年度召开县志编纂工作会议、编纂史志总结评比等,从而提高人们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对编纂志书重要性的认识;全面发动编写分志和镇志,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镇的党组织分别将编纂分志和镇志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做到有领导分管,有编写人员撰稿,积极完成《规划》提出的编写任务。

(二)编纂《萧山县志》的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

编纂《萧山县志》采用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即全民动员,向全县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征集文稿、文摘、文物等史料,约请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和知情人提供线索、提供资料、专访和撰写回忆录,形成全县上下参与修志氛围,共同努力,编写新的《萧山

县志》。

（三）充分发挥各种传媒作用

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各种传媒，广泛宣传。编纂《萧山县志》期间，几乎天天能够在报纸或广播或电视等传媒中听到编纂《萧山县志》重要意义和编纂县志进展情况的消息，推进县志和行业志、部门志、镇志等的编纂工作。

三、重视编写人员的选择和培训，顺利推进编纂志书

编写人员的素质决定志书的质量。编纂《萧山县志》期间，萧山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编写人员的选择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重视编写人员选择的同时，在不同修志阶段采取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培训编写人员，提高编写人员修志理论和修志技能，使修志工作顺利推进。

（一）编纂首轮《萧山县志》重视编写人员的选择

优选编写人员是编纂志书极其重要的工作。为编纂志书把好人员关，萧山县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各单位做好选聘编写人员的工作。首先考虑从本单位文化素质和写作水平较高的人员中挑选，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员从事编写工作。如果单位的人员不能胜任编写某一个事物篇目，在域内和域外聘请特约撰稿员。

（二）不同修志阶段采取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培训编写人员

首轮编纂《萧山县志》期间，在编纂县志起步阶段、搜集资料编写分志阶段和总纂志稿阶段分别采取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培训编写人员，提高编写人员对修志的每个编纂程序环节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编写人员修志理论和修志技能，使编纂县志、分志和镇志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1. 编纂县志起步阶段。（1）召开分志编写人员会议。为推动和指导各单位编写工作全面展开，提高编写人员素质，萧山县编纂办公室召开分志编写人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及城厢、临浦、瓜沥三镇修志的专职和兼职的编写人员，共130多人。时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副所长魏桥和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陈功懋，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编纂地方志书和编写大事记的业务讲座，到会的编写人员深受教益。培训期间，县志办公室和县卫生局、粮食局、临浦镇的同志也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还认真学习了朱士嘉撰写的《中国地方志浅说》和李泽撰写的《修志必须认真拟订篇目》两篇专论。会议还就编写分志的指导思想、质量要求、拟订篇目、搜集资料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探讨。通过

会议,与会编写人员对全国地方志书的源流,对当前各地编纂地方志书的形势和现状,对编纂新志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以及编纂地方志书应掌握的原训、要领和基本方法都有了新的认识。一致认为,编纂地方志书是一件上慰祖辈,下勉子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自己能参加这一工作,尽一份力量,是十分光荣的,尽管有各种困难,也要勇挑重担,不负重托,虚心学习,勤奋工作,努力把自已承担的编写任务完成好。(2)《编史修志通讯》刊登《要编写好“分志”篇目》,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同志在中国档案学会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有关编修地方志的讲话摘录,编志动态。

2. 搜集资料编写分志阶段。(1)中共萧山县召开第二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编写部门的分志、镇志和专题史料。时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理事、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新夏在县志编写人员座谈会上讲课。来教授结合全国修志情况,阐述了修志工作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七个问题,即史与志的关系、分志与总志的关系、资料和论述的关系、新志与旧志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全面与重点的关系、关于人物传的问题等。(2)召开资料工作座谈会。在大多数单位已

拟订分志篇目、正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萧山县编纂办公室召开资料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分志、镇志编写组成员54人。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如果没有大量可靠的资料,修志将寸步难行。应该按照初拟篇目的要求,集中精力,搜集资料。要从档案、图书、报刊、文献等方面,广泛搜集文字资料。同时,还要搜集实物,采访口头活资料。大家还认为,资料的真实、准确是志书的生命,关系修志的成败,因此对收集的资料,切实做好考证和鉴别工作。(3)萧山县编纂办公室召开分志试写经验交流会,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城厢、临浦、瓜沥三镇的全体修志人员,共9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农业志》《物资志》《教育志》三编写组分别介绍了分志试写情况和经验。(4)《编史修志通讯》配合分志编写,先后刊登有《使用资料必须慎密》《稿件整理书写的有关常识》《方志突出地方特点浅见》《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等修志常识。《稿件整理书写的有关常识》介绍了书写要求、名称运用、注意用词、引文注释、时间表达、数字书写、度量衡用法。

3. 总纂志稿阶段。(1)召开第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中共萧山县召开第三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重点讨

论大家如何投入新修县志的总纂工作。通过会议,使大家认识到,实现总纂目标,需要在大家在思想上进一步统一对修志工作的认识;总纂是编修县志的关键性一仗,需要进一步加强领导;修志人员,需要树立献身修志的精神。讨论中,大家对实现总纂志稿目标,满怀信心。(2)会后,成立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审定分志、镇志和县志稿总纂。(3)《编史修志通讯》刊登《史志叙事尚简说》《一部有特色的地方志——介绍1941年〈徐沟县志〉》《诸言小议》《资料考证小议》,选载《围垦编》《水利编》《教育科技编》诸言。

四、部门志、行业志、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萧山编纂首轮志书期间,根据《萧山县志编纂规划》提出的分志、镇志与《萧山县志》同步编纂的要求,全面发动编写分志和镇志;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党组和镇党委分别将编写分志、镇志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都确定有一名领导负责此项工作。承担分志和镇志编写任务的单位,都选拔有德才兼备的人员从事编写工作。同时,办好《编史修志通讯》。利用《编史修志通讯》传达中央和上级党委对修志工作的指示,交流各地编写县级地方志的经验;选载萧山分志稿及相关史料,及时总结交流情况和编写志书常

识,为编纂萧山县志积累史料和核实史料,从而顺利推进县志、分志、镇志的同步编纂。

整个编纂县志、部门志、行业志、镇志工作由县委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县编纂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县志编审委员会负责编纂、审定分志和镇志,编纂全志事宜。其间,编纂每一部志书严格编纂程序,把每个编纂程序的环节完全落实到实处,不走过场、不走形式,确保编纂的行业志、部门志、镇志和村志的质量。

《萧山县志》总纂工作开始后,县委要求各单位,根据志书体例、编纂原则,“继续编写专志和专题史料”,并出版或编印部门志、行业志、镇志。

编纂首轮《萧山县志》的实践证明,部门志、行业志和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一)部门志、行业志、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

乡镇志有“小县志”之说,与县级地方志书都记述有较多相同的要项事物,而且要项事物的主体内容基本相似,只是有些要项事物的发端时间、发展情况不同,记述内容的侧重不同、地方特色不同,但分志、镇志、村志与县级地方志书记述的要项事物互为融合。所以,部门志、行业志、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相得益彰,可以达到

优势互补、详略互见、取长补短、科学完备的效果。

1. 将编写的各类分志和镇志融合成一体,即形成《萧山县志》的主体内容。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编写的环境保护、农业、水利、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交通、邮政、电信、电力、财政、金融、城乡建设、党群、司法行政、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分志;镇级机关编写的本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壤、土地、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交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俗和人物等事物要项融合成一体,即形成《萧山县志》的主体内容。将村志记述的上述事物融合成一体,即形成镇志的主体内容。

2. 将各类分志和镇志分别独立成志,即形成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邮政、电信、电力、财政、金融、城乡建设、司法行政、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类部门志或行业志的主体内容和镇志的主体内容。

3. 县志的分志又有许多事物要项与镇志、村志的内容互为融合。如县志的电信篇目记述:1991年9月1日,开通首期万门程控交换机,萧山电话号码由5位升至6位。1994年6月25日二期程控交换机并网后,萧山电话

号码由6位升至7位。各镇志、村志的电信篇目中,也都在这两个时间分别记述电话号码由5位升至6位、由6位升至7位。又如义盛镇志记述“1983年6月14日,义盛人民公社(今义盛镇)徐某某的家用电器修理户安装了私人电话。”经考证,县志中的农村电话篇目就记述“1983年6月14日,安装萧山解放以来首部私人电话。是年,全县安装私人电话2部。”

(二)部门志、行业志、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事半功倍

《萧山县志》极大部分的志稿都是由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等编写。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提供给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分志和镇志,只要根据志书体例和编纂原则,再增加建置、自然环境、气候、人口、社会、民俗和人物等事物要项,记述的篇目作些相应调整、记述的资料再充实,均能分别编纂成部门志或行业志、乡镇志、企业事业志等志书。部门志、行业志、镇志与县志同步编纂,又能得到县委和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县志编辑部的指导和帮助,所以,部门志、行业志、镇志、村志与县志同步编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为《萧山市志》副主编)

做党和人民的好战士

章为质

采访对象:章为质,1928年出生,浙江临安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195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通信员、炮团观测员等职,并在炮校学习。后任沈阳军区某部排长、副连长、连长,董存瑞生前连队连长,团侦察股副股长、股长、副团长等职,并于1954年、1956年两次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1979年后任临安县粮食局副局长。

一

1928年,我出生于浙江省昌化县颊口镇桥东村。童年时代,家里有3亩田,其中一亩是老祖宗的租田,需要交租。家里有父母、哥哥、嫂子和侄子共6口人,住的是两间两层的房屋,牛和农具三家合用。父亲去世很早,家里生活条件一般,解放后被定为中农。

8岁起,我在义涧小学分校上学,直到13岁。这个学校设在桥西一所菩萨庙里,我读了5年半书。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还小,印象不深,只看到村民挖马路,防备日本鬼子的坦克、汽车

进攻,我十五六岁时参加过挖马路。

小学念完,我在家务农,砍柴、种田等。当时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国民党军联合勤务部总司令部被服印染厂工作。我17岁时去上海找工作,因该厂不要人,于是到上海大诚绸厂做往经纬分厂送饭的事,后被服厂做袜子脱水工作。我使用的机器设备没有出现过故障,受到车间主任表扬。我在厂里的书法比赛和演讲比赛中获过奖。当时每月工资为8块钱(法币)。

1949年4月下旬起,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炮声越来越近。厂里召开护厂大会,一是反对把机器设备运往台湾地区,因为这是我们工人的饭碗;二是加强工厂保卫工作。因为厂门卫不辞而别,护厂大会推选我和蒋洪元两人当厂门卫,看守大门。该厂是国民党的军工厂,所以还让我们穿上了国民党军上等兵的衣服。

不久,上海解放了,解放军接管了厂门口的保卫工作,我回到原岗位。解放军睡地铺,与我们的宿舍隔了一层木板。他们唱歌,我就在双层木床

的上铺看。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亲如兄弟。国民党曾经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我们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太行山上》，才知道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形象是妖魔化了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政府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块银圆。

过了近一个月，厂里的军代表告诉我带上衣服准备学习去，并用厂里的小轿车把我从虹口惠民路1033号送到南翔火车站。厂里职工大多是浙江东阳人，我的两位同乡去当警察，只剩我是昌化人，这也可能是让我去学习的原因吧。

到南翔火车站后，我一看，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一共好几百人，我和他们一起等候。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一位解放军同志站到我跟前说：“谁愿意参加解放军？”我举手表示愿意。过了一会，他们就发给我一顶军帽和一个锅贴面包，一位同志用手朝人群一指，说这些人由你负责。我数了一下共19人，都是国民党军俘虏。我大声喊“出发”，就带着他们跟着俘虏大部队出发了。当天一直往南步行，不知道具体去何处。行军中命令都是口头传达，依次喊“跟上距离”“叫指导员上来”“往后传”等。行军一天，傍晚时分，走

得有点累了，在一个墙院里休息。连长召集押送人员开会，站在中间说：“前面过山谷，人员缩短距离。”突然俘虏中有人嗷嗷叫嚷，企图暴动。警卫战士用轻机枪、步枪一齐朝院子里开火，俘虏顿时一片肃静。到了后半夜1点左右，俘虏被送到指定地点。我饭后在接收地点的门口和衣而睡，第二天返回南翔。这次集体迁俘，是我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晚上开会时，我填写了一张革命军人登记表，才知道我加入的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训练一团二大队八中队，我当通信员。我就这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七一”党的生日时，大队教导员给我们讲课，从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讲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些都非常新鲜，解放军是一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不断壮大的部队。我们彼此之间都称呼“同志”，他们叫我“小章同志”。我觉得这个称呼很亲切，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中队长是丁泉，指导员是任化俊。三个排长中，两个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三排长的腿被日本鬼子捅过一刺刀，走路时有点瘸。

一天，我们坐闷罐车北上到镇江，恰遇国民党军飞机来，大队长命令不准下车。我从门缝里可以看到敌机俯冲、扫射，嗖嗖地把闷罐车车厢左后角

打成蜂窝状。我也听到部队的高射机关枪向敌机射击。敌机不久即逃走了。随后我们坐轮渡过江,到滁县牛奶厂住下。

我们中队负责国民党尉官甄别工作。有一次,在尉官中查出一位国民党医务上校,中队长让我把他押送到团部去。我拿起枪,子弹上膛,厉声对俘虏说了一声“走”。队长说:“慢着,等一下,你回来时一定要带回收条。”他怕我这个新战士不守纪律,途中枪毙俘虏。这个俘虏很不老实,几里长的路一路停停走走,一会儿要大便,一会儿要小便。我站在距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端着枪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送到指定地点后,我要了接收证明,回来转交给中队长。

甄别工作结束后,中队住到滁县城里,经常搞劳动生产。一次早上出发去割草,我在路上看到老乡吃豆饼充饥,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力气还好,老秤150来斤的东西能挑回来。大队把草料送到蚌埠去卖。

有一次在城墙上捡粪时,我还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女孩,立即抱回中队。队长让我送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问长问短,我笑着说:“她姓解,解放军的解!”

1950年4月,我们坐火车向南开去。解放军准备解放舟山群岛,我们

的任务是准备接收俘虏。结果5月敌人撤退了。我随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青年营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后行军到宁波,渡海至舟山群岛,在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山炮团当观测员。驴马是火炮的腿,观测员是火炮的眼睛,通信兵是火炮的耳朵。我学习各种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如正切法、交会法、导线法等。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领导让我们树立以岛为家的思想,抓紧训练。

二

1950年下半年,我从舟山群岛调到宁波炮训大队四队。我是青年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群众委员,又会说宁波话,领导让我利用业余时间多接触群众,多做点群众工作,如借用课桌和凳子的事就大多由我出面。一次,我在街上被派出所一名女民警拦住,她递给我一张借座钟的借条,上面有钢笔写的英文签名,座钟被送到当铺当掉了。我说回去查一查。调查从我们本队着手,当时使用钢笔的人不多,用铅笔多,我看纸条上字的颜色与墙报上字的颜色差不多。根据笔迹和颜色辨认,我发现签名是本队的人,他享受副排级待遇,生活有点讲究。我向领导汇报后,领导想了个办法,让当事人在部队晚饭后出大

门时辨认。晚饭后全队集合出大门，让座钟主人来指认，我和民警躲在墙角等。认定无疑后，领导让这位副排级干部把座钟归还原主并赔礼道歉。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散步路过莲花庵门口，见到一些尼姑正跪在地上做功课。战士们七嘴八舌，说共产党不迷信，她们还集体搞迷信。小尼姑耳朵灵，一个个都站起来跑了，只剩下老尼姑跪在那里。我把情况汇报给领导，领导说人民群众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类事情了。

还有一次，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喊我：“阿章，她的爸爸妈妈赶海去了，很长时间没回来，我们生活没有办法。”我明白她的意思，倾力相助，把用于买烟的钱都给了她们。我那时烟瘾不大，很快就熬过去了。后来教室墙上贴出了向我学习的标语。

我们排长（我在舟山工作时的老班长）让我做一件思想工作。与我在舟山工作时同班的一位姓林的战士文化程度较高，态度有点高傲自大。有人检举他曾是“三青团员”，老班长让我找他核实情况。我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和他谈心，他说：“共产主义能实现，我林某的主义也能实现。”我请他详细讲讲如何实现他的主义，他支支吾吾讲不出来。经过几次交谈，他最后承

认在学校学习时曾集体参加了“三青团”。我让他不要有历史包袱，向领导说清楚，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排长祝叶昌（山东人）找我谈话，给我讲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让我写入党申请书。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要为全世界劳苦人民彻底翻身不受压迫而斗争，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实现共产主义。入党以后怎么办？我写道：“入党后绝不骄傲自满，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军政文化学习。放弃个人利益，坚决服从党的利益。在任何环境中站稳立场，在危急情况下不屈服、不低头，永不叛党。”对目前时局的认识，我写道：“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只有台湾还没有解放。外强中干的美帝国主义还想发动战争，我国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世界人民及民主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苏联在全世界起到堡垒作用，保卫世界和平。”入党介绍人王志远（江苏人）介绍我时，说我政治思想有见地，认识好，忠实可靠。另一位入党介绍人祝叶昌说我劳动好，埋头苦干，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当时支部书记是张德广。团党委会批准我入党，候补期从1951年2月13日至1951年5月13日，共3个月。

转正前,我在自我检讨中写道,优点是学习积极虚心,不懂就问;对群众纪律很关心,经常向群众宣传,教育群众;开展思想斗争;学习悟性好;团结别人,讲自己讽刺话的也能忍耐。缺点是行政汇报较少。党小组经过讨论,同意以上我对自己的评价,按期转正。

1951年5月27日,经民主评定,我在维护解放军城市纪律方面表现突出,荣立“二等遵纪功”,奖品是一件印有“人民功臣”字样的背心。

1952年春节后,我到南京汤山第三炮兵学校学习。学了一年炮兵数学、一年炮兵技术。学员中有初中生、高中生和副排级干部,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我到沈阳军区炮兵第十师三十二团七连当指挥排长,部队驻在新金县普兰店。

1953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在朝鲜仍驻防了一段时间。1954年初,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到沈阳潘建台给志愿军炮兵团以上干部演习进攻战斗中的指挥排动作。这次演习反映很好,观众要求录音,带回作教材。我在沈阳小河沿用了大概一周时间进行录音。

三

回部队没多久,我就到北京参加

国庆受阅训练去了。我们属于用苏联卡车牵引的122毫米榴弹炮方队。要求训练队列,如“三挺一瞪”,即腿部挺、胸部挺、脖子挺,眼睛瞪起来,但是不能有凶样。当时生活比较艰苦,我们睡的是泥地面,稻草翻翻晒晒,几个月下来都没有了。

我们在南苑机场、西苑机场预演了几次。临近受阅时,车辆发动机都经阅兵指挥部技师验收,油箱都用水、沙子清洗干净。车辆使用72号汽油,后改用苏联的90号汽油,贴上封条。晚上支部委员站岗放哨,看管车辆。受阅时4辆车并排走,前后不能有超过一拳头的距离误差。

1954年10月1日受阅当天,早上天没亮,我们就集中在天安门东长安街附近,不能带个人物品。10时许,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代表团贵宾登上天安门检阅台,广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欢呼声和掌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的陪同下,乘车从天安门出发,检阅了排列在广场上的各部队。分列式开始,各方队以严整的阵容相继通过天安门广场,展示出了优良的训练成就和强大的战斗力量。解放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当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

受阅部队和大学生的联欢活动。我第一次看到漂亮的烟火和四面八方的探照灯照在天安门城楼上空。随后我在北京休息了两天,参观了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回到部队,我升任七连副连长,不久到二营六连担任副连长。

我参加了1954年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的一次大演习。这次演习定位为在模拟使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的演习,我在炮车上看到过蘑菇云。副营长带我们侦察了6处阵地。当晚下了雪,刮着呼呼的北风,河岸被厚厚的积雪盖平了。第二天,他让我带领全营转移阵地。坐有一个班战士的车辆拉着榴弹炮在行驶中,我看到雪中露出岸草尖尖,不远处却白雪皑皑,立即下令停车。由于我观察仔细和反应快,避免了一次翻车事故。这一年我被授予少尉军衔。

到最后一个阵地要进行实弹射击。因炮弹重量不同,我作为副连长负责计算加减速高低量。为了活跃阵地生活,师文工团员表演苏联舞蹈,战士们直喊“副连长不跳,我们都不跳”。我说不行,等我忙完再跳,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参加。实弹射击时,全连齐放,4发弹着点成一线。在9个连队的演习评比中,我们连被评为“红旗连”。演习完毕,我部回辽宁海城北营。

这次演习可能是为1955年的辽东半岛大演习做准备。当时还没有实行军衔制。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中苏领导人就旅大苏军撤军问题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由于苏军将要撤走,我们去接收其在旅大的防区和装备。从海城出发到金州休息时,司机忘记把引擎防寒布打开,结果快到目的地时,发动机冷却水沸腾了。其他车先走了,我下车找到苏军,敬礼后向他们要水,苏军帮忙添加了水。我记得出发时宣布的目的地在老虎滩,看到白云街院子里伸出一排炮管,才找到目的地。第二天,到登沙河高家村接收了苏军4门160毫米迫击炮。1955年3月31日,我们几位同志和一位苏联军官拍了“友谊临别纪念”照片。在各中队、大队(营、团)官兵对口学习、交接的基础上,以编队为单位分别举行交接仪式。接管苏军装备后,我接到命令,到师指挥连担任副连长,分管侦查工作。测地排在李万鹏排长带领下到福建前线进行大地测量,为炮击金门做准备。

1956年2月,我到二〇三团二连当连长。132火箭炮全军只有3个团,苏联人称喀秋莎。我用苏军的装备和器材给新兵连做示范射击。在连长火

箭炮射击指挥比赛中,我获得第一名,奖励为实弹射击一次。年终实弹射击,每次打12发。部队买的苏联炮弹价钱很贵,听说一发炮弹值一两金子,所以提高射击精准度也是为国家节约财富。

7月起,我第二次到北京参加132毫米火箭炮方队国庆受阅训练。我除了参加队列训练,还要练习口令——经过天安门时喊“向右看”。我在靠右边第1辆炮车上,声音要让左边的第4辆车都能听到。为了保持嗓音,方队领导发生鸡蛋给我喝。大概在这段时间,我晋升中尉军衔。通过多次演练,10月1日正式通过天安门受阅。训练期间看过多次慰问演出,有京剧名家张君秋、马连良等。

1958年师里召开运动会,团里命令我们一营组织军官建制排,我担任排长,参加师里比赛,项目有手枪、3公里武装越野、单杠、双杠、木马等。我排获得了全师第一名。我个人在20米手枪精度射击中命中28环。12月12日,我获沈阳军区政治部颁的“五好干部”三等功一次。我们连队建设搞得比较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司务长是管发干部工资和战士津贴的,他把钱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自己去取。最后他算账,一分不差。

我严格管理连队。我喜欢战士头脑灵活,不怕他调皮。师里的军务科科长到我连队当兵,但是星期六过组织生活时,他不请假私自离开了。我让班长开班务会批评他,重点是他来当兵没有放下官架子,没有把连长、排长、班长放在眼里,身为军务科科长不守纪律,让他做检讨。他在班务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1959年春节后,我调到董存瑞生前所在的六连当连长。这个连队的素质非常高,干部战士都欢迎我的到来。晚上点名时,我第一个是点“董存瑞”,董存瑞班班长站出来回答:“董存瑞同志1948年5月25日下午3点半在解放隆化战斗中光荣牺牲了。”然后再继续点其他战士的姓名。在董存瑞班的宿舍,留一个有被子的空床位。欢送老兵、迎接新兵,我们都要求大家把董存瑞连队的光荣传统继承好,并发扬光大。

1959年,我担任团侦察股副股长,为副营级干部,上尉军衔,和作训股的一位参谋一起负责全团训练。年终实弹射击时的科目是“进攻中的炮兵连”,各连队依次24小时考核。经过连续六天六夜的演习考核,6个连顺利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回到集结地,饭菜送到我跟前时,我倒在炕上睡着了。炊事班长说:“等他醒来再吃吧。”1960

年的师参谋工作会议上,我受到通令嘉奖,升为正股长。

四

1964年部队开展大比武,我负责侦察分队的训练。侦察分队挑选的新战士文化程度比较高,头脑灵活,我和两个营部参谋也严格训练。1965年,侦察分队中有70多个人得到提升,有的侦察兵提拔当火炮瞄准手(副班长),有的指挥排长当副连长,有的当干事、参谋。一个新组建单位向我们要一个侦察兵,我让二营营部挑一名。过了个把月一封来信说,那位同志已当指挥排排长。所以说,不光是人调出去了,他们还把优良的作风和过硬的技能带去了。部队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练好军事技术。

1965年,沈阳炮兵接到沈阳军区的任务,在牡丹江拉子沟建通信机房,让我带六连去负责筹建。当时我已晋升大尉军衔。技术工人不需要雇,我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操平、放龙门板由侦察参谋负责,木工问题由团后勤木工解决,土建问题由战士解决,采石由我负责。我会看图纸,将室内明线改成暗线。烟囱上无避雷针是很危险的,我要求装上铜质的避雷针。利用一眼泉水解决了不花钱用自来水的问题。年终,六连被评为“四好”连队,

上级让我介绍经验。我调为正营级。

在此期间,我曾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当时恰逢我儿子出生,而我不在家。他因出生时大脑缺氧,智力受到了影响(三级智残),但我未提任何特殊要求。目前我和儿子在一起生活。

1967年,我们团没有生活用煤了,团领导让我带营部30多个人去七台河挖煤。刚到消防队住下,一位造反派来报两派红卫兵要武斗。我让部队集合起来,消防队员递给我一个手提喇叭,我大声喊:真正革命造反派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要团结”“要文斗不要武斗”。边上的老百姓都喊大军来了。造反派一看这个阵势,吓得丢了手中的棍棒,落荒而逃。我们及时制止了一场武斗。

我们不懂如何挖煤,就听从技术员的专门指导。50厘米以上的煤层是国家的,50公分以下的是属于我们可开采的。矿上支援了挖煤需要的坑木。我们没有矿灯,就用蜡烛照明。挖出的煤需要战士们用麻袋背着往上爬行才能运出。战士们除了牙齿、眼睛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我下去背煤,战士们拉住麻袋不让我背,他们说我们每个人多背一块就够了。于是我就在矿井上做好后勤工作。我向邻矿的人学会了镐头淬火,关键是掌握火候,使镐头更耐用。团里的烧煤问题

解决了,师部向我们学习,我被调到鸡东县去挖煤。

1969年10月,我任二〇三团副团长。我与师政委正在参加沈阳军区党代会,突然师部通知我马上回部队。原来解放军总后勤部交给我师100发M-13火箭弹改M-53火箭弹的试验任务。原先炮弹发射后不旋转、稳定性差、散布大,现在改为飞行中能旋转,以提高射击精度。在我的实践中,M-13火箭弹有1%—2%的“怪弹”(不爆炸),这需要进行试验。我在原定靶场看到,向东打弹道下远处有火车站和村庄,向西打远处是原始森林,真使人胆战心惊。如按原方案执行,会造成严重后果。师长说一切由我自行决定。

我另选靶场的试验结果与我原先判断完全一致,一发火箭弹尾翼掉在炮后,弹头掉在炮前900米处;一发方向偏300密位,系不发弹(不爆炸)。如果按原方案,弹道下有村庄,免不了要闯大祸。试验结束,我交出了100发炮弹射弹散布图,每发都注有准确坐标。总后装备部评价:“计划细致,组织严密,数据准确,资料比靶场还详细。”这是我分管军事训练以来第一次执行任务。回到部队,团长任贺非常高兴,对我非常信任。

1975年部队在北安执行生产任

务,属于半训部队。苏军机械化程度高,特别是其坦克对我军威胁较大,训练炮兵打坦克是当务之急。师长强调年终实弹射击科目就是打运动中的坦克,天黑接受任务,闭灯驾驶,占领阵地,实施射击。我在团党委会上汇报后,大家认为这是全训部队都难以完成的科目,更何况是半训部队,以为我误传指示。后师长说老章传达的指示没有错,苏修坦克进攻时不会问你是全训还是半训,照样打你,所以半训部队也要打运动坦克。团里决定由我抓示范连(该连刚刚完成生产任务)。

第一步,我着重抓指挥分队。按1000:1的比例缩小场地合练,在开设交会观测所基础上,用绳子牵动物体以代表坦克,令左右观察所进行标定,报出分划,指挥排长进行图上作业,标出坦克行进路线。第二步抓司机训练。我亲自率领他们徒步行军,让他们观察深秋东北各种物体的颜色,如当地道路是黑色的,草丛是灰色的,小树丛是淡黄色的,路上发亮的是水坑。车与车之间,前车挂白床单以视引导,避免撞击,为夜间闭灯驾驶打下基础。第三步,指挥分队与战炮分队合练夜间行军展开战斗队形,要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第四步,夜间火箭炮打坦克。在集结地黄昏受领任务,夜间闭灯驾驶展开战斗队形,完成射击任务,

炮弹爆炸瞬间,模拟坦克灯停止牵引,炮弹在“坦克”周围爆炸,弹群中心覆盖目标,圆满完成试点工作。领导在总结时说,示范连给部队树立了夜间火箭炮打坦克样板,干部战士坚定了信心。

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摄制冰天雪地里火箭炮连带弹奔袭纪录片,重点是火箭炮齐射镜头。团党委决定我负责阵地指挥,六连担任演习分队。在正式摄制时做到了行进间展开战斗队形。因为积雪太厚,经迅速清理炮位后,完成射击准备。一声令下,全连齐放,10秒钟内将炮弹全部推完。顿时震耳欲聋,炮弹后座火焰气流将雪溶化,夹带着黑土,像发射长征火箭一样,整个阵地腾起灰色雾霾,冲向天空。待撤出阵地时,天空雾霾变成细雨降下,战士反穿的羊毛大衣都染成了浅灰色,一个个脸上斑斑点点像出麻疹一样,却咧着嘴巴笑得正甜。真的要感谢天然“大画家”,创作出了一幅凯旋的景象。

部队用客车、拖挂、拖拉机等帮助当地群众解决运输困难。比如,驻地孕妇难产须送医院,下大雪时养鹿场的饲料运不进去,吉林糖厂盘石办事处甜菜装不上火车,盘石吉林影片仓库没有煤取暖,过路汽车没有汽油,我都帮助解决。在团领导班子里,我列

于团长、政委之后。一次部队里放露天电影时,放映员突然喊:“北京来电,章三号快到值班室接电话。”原来是我炮校同学在炮兵司令部值班,正在测试通信是否畅通。为不占用线路,通话很快结束。此后当地群众传出一句话——有困难找“章三号”。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努力为他们做点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

1979年9月1日,我从沈阳军区转业到临安工作。1979年11月到1984年1月,我担任临安县粮食局副局长。负责的主要工作有:一是抓配合饲料生产。粮食局党组开会,但是思想不统一,还要撤销饲料公司。第二天,县委组织部通知开饲料工作会,我说让郎副局长去参加。他回来说饲料公司不能撤。局里又统一了思想,主抓猪饲料生产。在县委书记黄太和的领导和支持下,粮食局在上甘建了饲料厂,年产200吨。饲料生产出来后,群众不相信,我们让各粮管所设了饲料宣传员。经过多次试验,效果良好,猪毛光起来了,增肥快,猪饲料逐渐推广开来。后来又发展了鸡饲料、鱼饲料等。为方便昌化、昌北群众,我们在昌化办了年产2000吨的饲料厂。二是抓子女顶职,更新职工队伍,开展文化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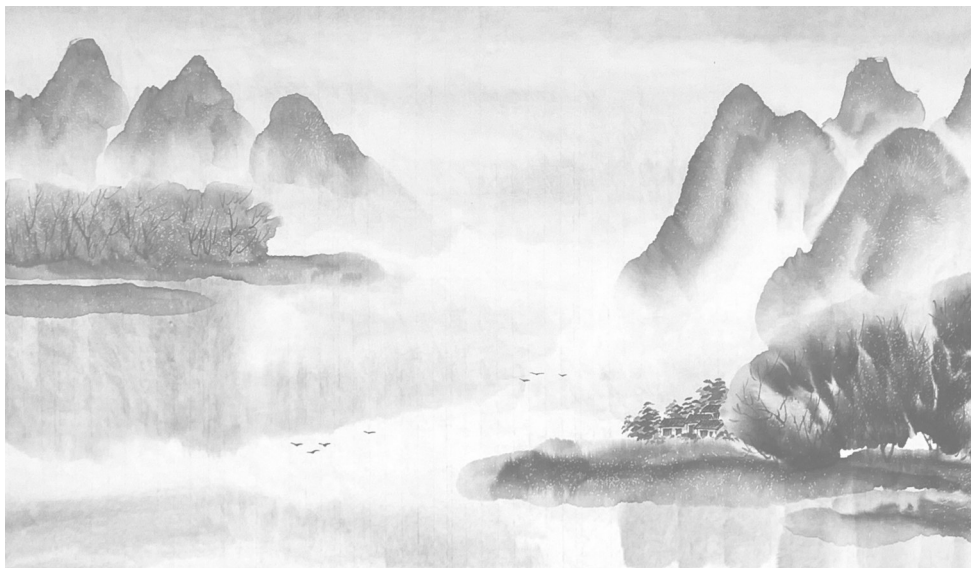
习。三是抓党建。我来之前粮食局15年没有发展党员,我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后发展了3名党员,壮大了党员队伍。对个别拒缴党费的特殊党员,我认真进行批评教育。为平反一件蓄意陷害冤案尽了力。四是抓汽车队建设和职工宿舍建设,及时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五是提议引进小王子食品。当时我已经退下来了,大概在1985年的一个白天,我在县城天目路边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小孩子吃的“口口脆”(江苏丹阳一家工厂生产的),觉得味道很好,就向县粮食局局长张石镜提议办一个生产食品的工厂。当时粮食局下属的粮油厂经营范围比较单一,基本上生产面条,过年前才生产年糕。我的提议得到了局长的赞同。

我在工作中廉洁奉公,找我办事的,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我一定帮助,但是决不准送我礼品。

离休后,我最大的爱好是参加离休干部钓鱼协会的活动,募集资金,组织比赛。我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都曾庄严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怀抱理想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现在的时代日新月异,但共产党人的理想永远不能变,而且要积极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贡献力量。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做人民的勤务员

高树德

采访对象:高树德,1928年出生,浙江德清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嘉兴专署公安处预审科工作,后任余杭劳改中队副队长。1960年到临安县公安局预审股工作,后在昌化卫生学校从事后勤工作,1960年11月起长期在昌化人民医院工作,任后勤总务科副主任。

—

我出生于1928年,老家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西岑村。那里开门见山,沿山溪7个自然村都靠毛竹、小竹为生,走出去要翻山越岭。我母亲长期待在娘家,父亲在武康镇做毛竹生意,我和阿妹都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母亲去世时,我才13岁。

村里对教育比较重视,我在一所私塾读了两年,接着上村里的小学。小学毕业后,我考上武康县立简易师范学校。1949年5月武康解放时,教师都离开了学校,学生大部分回家,一部分在县政府参加工作。

我们6个同班同学在一份报纸上

看到一则消息,称湖州办了一个湖嘉公学。于是,我们找到县政府去,受到一位同志很热情的接待。我们提出想去湖嘉公学学习,希望能给开一份介绍信,他立即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段话,盖上了“武康县人民政府”的印章。这个章是长方形的,下面还签了他的姓名,叫杨在浩。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山东新泰人,武康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湖嘉公学是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地委(嘉兴地委)为培训基层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孙章禄任校长。我们从武康出发,走了大概50里路到湖州。入学考试的内容是全国的形势和对共产党的认识。我们6个人都被录取了。学员住在祠堂、庙宇里,全部实行供给制。因为住得很分散,我们也不清楚整个学校有多少学员。学员分成小组学习。我所在的小组有十多个人,除了我们6个人,还有南下的青年人,我为小组长。学习方式主要是听报告。记得有一位姓吴的领导来上过关于革命形势的课,指出要坚持共产

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解放全中国。地委书记钱敏来上课,也是讲全国的形势。这些内容对我们学员来说,既陌生又新鲜。听了报告后,学员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讨论,每个人都要发言,我也积极发言。有时几个小组合并一起组织发言,每个小组的代表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带着资料上街搞宣传,进行募捐。回校后总结,公布各个组的成绩。学校还组织文艺活动,学唱《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

学了两个多月,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农村去工作,其他的学员重新分组。离开前,每个小组组织讨论,每个学员发言表明自己参加工作的态度,要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到10月1日,学习结束。我们一起入学的6个人,有4个人已经提前去工作了,我和陈祥茂被通知去嘉兴专署公安处报到。

专署公安处设在一个大庙里。我们都穿上了军装,还发了被子、蚊帐,生活上仍实行供给制。吃饭很简单,北方来的人有顿饺子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我到预审科工作,科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科长姓刘。不久两个人调走,就只有两个人了。因为科里没有犯人,我们主要到专区各个县、两个市的公安局去调查犯人数量和执行的情况。后科长调到嘉兴的明丰纸厂保

卫科当科长,预审科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后崇德县公安局乔局长来当科长。他身体不是很好,经常叫我陪同他到下面跑。

预审科有一个任务,就是到各县去了解判刑10年以上、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犯人的情况,把他们集中到公安处来。办理手续后,将犯人押到嘉兴火车站,送西北劳动改造。女犯人送到杭州雨伞厂劳动改造。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预审科一下子调来了14个人。各县送来的材料堆得很高,都等着反馈意见,所以我们的工作很紧张。我们要重新看材料,审查有关犯人的罪行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足。我们审理人员签字后,送公安处处长审核签字。他签字后,再送到地委去审批。我有时也送材料到地委书记处。地委书记、专员签字后,有关材料再返给各县,由他们执行。

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过后,有关部门组织了内部审查。我因为父亲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缘故,被审查了两个月。

二

建德专区撤销后,临安等县划归嘉兴专区。1953年,我第一次到临安、於潜、昌化,各住了一夜,了解各县公

安局预审科的工作情况。

余杭临时办了一个劳改中队，直接由嘉兴专署公安处负责管理。这里主要关押年纪比较大、身体不太好的犯人，或者判刑5年以下的犯人，不送外地。公安处派了5个人去，我任副中队长。我分管两个事情：一是教育犯人，我根据省公安厅下发的材料开展教育活动；二是审查犯人的家信，家信一种是用明信片的，一种是用信封的。

余杭县公安局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本县和德清交界地区外来人员情况的工作，把我也抽出参加调查工作。那个地方卖毛竹和烧炭的外地人很多。

1958年4月，我被下放劳动。下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体下放，一种是投亲靠友。我考虑到爱人是城里人，两个孩子还小，就选择了投亲靠友。我到了德清县牌头乡四联村，我的姑母和妹妹嫁在那里，以便她们帮助照顾一下家人。当地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参加哪个小队劳动？我说就参加姑母所在的小队吧。那里是水库淹没区，田很少。我跟着农民劈山、除草。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农活是熟悉的。队长告诉我不用参加评分了，我说要参加评分。他说那么评你10分工，我说10分没有的，评个七八分吧。

大队会计调到纸厂之后，支部书记让我兼做大队的财务工作。

德清县山区公安派出所的所长陈良夫到村里来，向村支部书记提出把我借给他们用一段时间。实际上派出所只有两个人，一个所长，一个内勤。当时“大跃进”已经开始了，派出所让我把当地各村的“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人员清理一下，表现不太好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清理结束后，我仍回四联村。

1960年4月，临安县公安局通知我到临安工作。临安县公安局局长是赵久廉，我在嘉兴公安处工作时，他送案子材料来过（那个案子是关于临安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蓝菊香的弟弟的）。他对我说，预审股的戚宣惠生病住院，而预审股里又押了许多犯人，你熟悉这一工作，去清理一下。他告诉我，清理工作分三种情况：第一种，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犯人，将其材料整理好，送他签字，再送到法院判决；第二种，被捕时罪行比较轻，可能有错误的，将其材料整理好后，该释放的就释放；第三种是中间一部分的，有罪行而材料不足的，想办法调查清楚，这部分人先缓一缓。他对我说，这个事情要抓紧，有的犯人关很长时间了。到10月，

这项工作告一段落。

赵久廉曾经担任临安县商业局局长,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因为同小资本家关系的问题而被撤职。后来公安局预审股工作,没有职务。问题弄清楚后,因工作积极,被提升为局长。

蓝菊香所在的农业合作社刚刚办起来时,账目等材料被烧了3次,是用烧石灰的柴火点燃的,连仓库也着火了。起初怀疑是一个老农民干的。因为这是临安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发生的案子,我们在嘉兴公安处处长办公室讨论案子时,处长、预审科科长和我都参加了。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是这个老农民干的,这个人是在贫下中农,一贯忠厚老实。我们决定让临安县公安局先释放这个老农民,再做进一步调查。后来弄清楚了,是蓝菊香的阿弟放火。他同姐姐的关系处得不好,姐姐蓝菊香的工作能力比较强,他觉得自己吃亏受气了。因为罪行不严重,判得比较轻。

三

我曾到昌化卫生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地址在原昌化阀门厂。县委组织部说有几个医生已经去了,让我去管总务工作。去了才20多天时间,卫生学校停办,医生撤走。我同临安县

卫生局联系,卫生局让我把发票和财物整理好,嘉兴疗养院要搬到昌化来,把东西移交给他们。

1960年11月,我到昌化人民医院报到,还是管总务工作。这个医院设在一个祠堂里,医护人员不到30个人。科室比较简单,没有专门的药房,医生开药后,要去医药公司提取。因为农民比较穷,除了妇产科比较忙一点,来看病的人不多。东街、西街的农民来看病,有的不付钱就走了。记得有一个家长背着12岁的小孩来看急诊,结束时没付钱就走了。这家人住在湍口一个山坞里,到了年底,医院派人去要医药费,我也去了。我们发现,这户人家生活确实困难,当时就没有再要钱了。到这个孩子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钱来付医药费。还有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子掉在了氨水池里,来医院治好病后悄悄地走了。过了一年多时间,她家人把钱送来。不是说当时没有病人,而是人们看不起病。这是一个大问题。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求把医疗卫生战线的人力、物力配置到农村去,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后来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为新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为医院的后勤总务科副主任，职工的衣食住行都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工作服不是工厂加工完成的，而是请裁缝来做的。做好后，请印刷厂的人帮助印上“昌化人民医院”的字样。房子漏了，要及时修补。食堂也是管理的重点。后来我院建成了门诊大楼，原计划建4层，但是临安县县长没有批准，最后建了两层。

医院算是个大单位，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比如说农业大检查、农村“双抢”，我经常被安排去参与这些工作。1963年5月，中央通过《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1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这两个文件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临安各个公社的书记都集中在玲珑山开会，昌化医院的支部书记和我也参加了。我被安排到玲珑山公社桥里大队协助贯彻“双十条”。小组有4个人，除我外，还有天目山林场的党支部书记宋永增（任小组组长）、於潜中学的包老师、玲珑山公社妇女主任金秀英。这个大队规模比较小。社教的重点对象是干部，调查他们的经济问题，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及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了发现问题，我们天天访贫问苦。工作了4个月，了解到

大队干部之间不团结、工作作风不端正等问题，由组长向公社做了汇报。1965年1月，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去昌北参加贯彻“二十三条”的工作。到每个大队开干部会、社员会时，都将“二十三条”原原本本地读一遍。比较小的大队，集中开一次会传达。我直到大年三十才回家。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比较平淡，同别人比起来，我没有什么突出的方面。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贡献也比我大得多。

四

我爱好诗词写作，离开工作岗位后，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这一爱好上。我的书架上几乎都是与诗词有关的书和杂志。通过诗词，我交到了许多朋友。

2016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我写了一首《临江仙》来表达我的心情：“茹苦含辛思上进，弘扬国粹钻研，多年探究力空前。酬和抒壮志，起舞步翩跹。喜看临安新面貌，齐心合力攻坚，鼎新革故竞争先。神州芳草地，欣赏笑开颜。”

2020年,是新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我有点担心。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迅速地控制住了疫情。我每天都看《参考消息》,外国对中国的抗疫成绩评价也很高啊。从年初到现在,我写了好多首与抗击疫情有关

的诗,比如这首《战疫情》是歌颂我们党的:“春来天暖艳阳光,突发疫情心莫慌。上有中枢强领导,向前战斗勇炎黄。”中国共产党确实很伟大,我们的国家有光明的前途。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回忆与怀念

章敦仪

采访对象:章敦仪,1926年出生,浙江临安人,1949年初参加昌化青年干部训练班,5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昌化县昌西区民政兼财粮助理员、昌西区粮库主任、土改工作队秘书。1951年到昌化县委统战部工作。1954年起长期在中学工作,先后任昌化中学、颊口中学、鱼跳中学、湍口中学、白牛中学教师。

一

1926年,我出生于浙江省昌化县龙岗乡上汤村。我家做纸加工生意,兼做豆腐卖,生活还过得去。

我8岁开始在龙岗小学读书,前后读了6年,接着上昌化中学,后来考取刘海粟等人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上海就学期间,我和同学去看望过在上海秘密养伤的解放区来的人。在学校地下积极分子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裘正(当时叫周平)。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斗争。我是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参加了上海学生运动。记得1948年上半年的

一天,我们在徐家汇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游行,全班同学基本上参加了,只有那些实际上监视我们的“青年军”没参加。游行活动从上午8点开始,下午2点多结束,我们手拉着手走在前面。我还上街发过一次传单。同村的周易是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我不得不停学,返回家乡。

1948年8月,受董必武同志秘密派遣到杭州从事策反工作的裘正出任昌化县县长。到昌化后,他在我家住过几个晚上,一直在楼上。因我家兄弟多,后来他转移到周易家里住。周易家离我家近,四面有围墙(解放后我家的房子给供销社开店使用,周易家的房子做药店使用,开始是无偿的,后来付给租金)。

裘正在昌化县城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对外称“昌化青年政治工作队”,地点在县政府斜对面的戴家祠堂,集聚起义的力量。1949年2月,训练班开学,徐文焕、周易、章本仁、程德辉、凌元浩、凌士贤、章敦信、洪焕文和

我等60余人都是学员。王皞(即王野耕,昌化县顺溪乾山村)、周易主持日常工作,政治课由裘正讲授,丁文波负责军训工作。裘正曾是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第四期教员,他办的这个训练班完全采取延安的教学方式,说:“我要把在延安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们。”

青训班重视革命思想的教育。我记得的书籍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有的是从上海带来的,有的是裘正弄来的,有的是训练班自己编的。我有一支步枪和一支打不响的驳壳枪。

我是训练班的文化教员。由于裘正的带头作用,训练班教的都是革命歌曲。比如,我教过《你是灯塔》(又名《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首歌创作于山东沂蒙革命老区,我教的时候很有劲。还有仿照《保卫黄河》改编的《昌化在咆哮》和《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等。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来说,歌曲是启发他们革命思想、提高他们革命斗志的一种有效方式。

4月9日,因获悉国民党浙江省政

府派来了新的县长,并派兵要对昌化青年干部训练班采取行动,裘正带着县自卫大队的两个中队以“剿匪”为名,向昌北桃花溪方向撤退,投奔活动在安徽宁国的游击队。当晚住在白牛乡三星村的驼坞。裘正决定,由他带领两个中队继续向昌北桃花溪方向前进。派章师弼先去宁国向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汇报情况,要求他们派部队接应,派王野耕于第二天一早再进昌化县城,将青训班和自卫三中队带出来。

4月10日下午,国民党派来的新县长陈启贤和省保安团一个连已经到了昌化县城。反动派包围了驻在戴家祠堂的青训班,架起机枪,保安团入内搜查。张武、王野耕、姚世虎被捕,当时我和其他学员都在现场。他们被押送到杭州,后在六和塔附近被杀害。青训班学员和城内的自卫队第三中队全部被缴械。

4月11日,裘正到达桃花溪的雨头湾凉亭时,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的钱敏、孙章禄两位同志已在等候,钱敏与裘正以前就认识。4月12日,裘正率部到安徽宁国的万家桥,正式宣布起义。边区工委对起义部队做了整编,并成立了苏浙皖边区人民解放军浙西支队和浙西办事处。

4月22日,听从外面买米回来的

凌元浩说,解放军渡过长江了,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振奋。国民党大势已去,昌化反动当局在忙于为自己找后路,对我们的看管明显放松。不记得哪天了,我们趁看管放松时跑了出来。我是穿着炊事员的衣服出来的,经朱穴坞,过石坦村,翻岭回家。

没几天,我们接到一封裘正的亲笔来信。在老昌化中学后边山脚,我向十多个原青训班学员传达了信的内容。裘正在信中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说自己已任苏浙皖人民解放军浙西支队司令员,要原青训班学员集中。信的内容传达下去后,大部分学员于4月30日前集中到了龙岗(汤家湾)附近。4月30日,浙西支队和宁国游击区的民兵一起返回昌化县境,午夜进攻县城。陈启贤部的国民党军逃往於潜,昌化获得解放。宁国民兵陈先财、昌化民兵王长贵牺牲,陈阵大队长负了重伤。5月1日下午,周易和我带领20多名原青训班学员从汤家湾到昌化后葛村参加浙西支队。

5月11日,安徽过来的国民党溃军100多人进犯昌化县城。经过激战,浙西支队撤到河桥。12日,浙西支队回击,又与国民党军激战。我们村的章敦信比我小几岁,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于聚秀村黄泥岭的一个池塘边,当时我和李贤贵在他身边。15日,浙西

支队到龙岗休整。后来裘正带着浙西支队一部分人去临安,接受第九军分区整训。我因为保管一批档案文书,没有随他离开。裘正调浙江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后去了上海。开始几年我们还有书信往来,后来中断了。直到1983年我们才恢复联系,共同为澄清青训班的性质、浙西支队与皖南游击队的关系等问题努力。浙西支队的成员,有的到地方政府工作,也有部分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后,由于多方面因素,又回家务农。周易成为昌化中学的骨干,后去桐乡工作。梅发跟裘正离开昌化后,即去上海工作,与我联系中断,到1984年恢复联系。

5月28日,南下大军解放了昌化县城。几天后,我和周易等四人持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领导人开的介绍信到昌化县委报到,并向县委介绍了浙西支队和苏浙皖边工委以及昌化县的情况。县委决定,我随同昌西区委书记陈汉吉、区长袁广立去工作。

我还要说一下,王野耕等人牺牲后,周易、梅发和我在昌化办了野耕书店,销售进步书籍。如1949年书店销售过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扉页上注明“谨以此书的出版,纪念因昌化起义而被反动派枪杀的王野耕、姚世虎、张武三烈士!”昌化解放后,这个书店经营了一年多,后改成人民书店。

周易家是开药店的,书店的经费主要是周易家出的,我家也资助了一部分。

二

我们背着两大捆《浙江日报》从昌化出发,步行到颊口。昌西区委、区公所成立,区委书记陈汉吉,区长袁广立,施锡文任组织委员、王振乾任宣传委员、蒋文合任民运委员,区公所设在桥东村养托堂。我任民政兼财粮助理员,另外还从事文书、档案整理工作。

白天,我们只留一人在区机关接待来访百姓和办理有关事项,其他同志都下到各村,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我也一样下村去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当时规定在贫苦农民家搭伙吃饭,并付搭伙费。

不过,国民党的残兵游勇和特务土匪活动非常猖獗。昌西地区还有地方恶势力。另据反革命分子王履昭后来交代,他曾经身藏手榴弹,想趁我们吃饭时炸区机关,后见我们吃饭时还背着枪,才没敢动手。

新政权积极发动群众,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土匪游勇没了生活来源,就很难生存下去,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经常在群众的监视之下,行踪很难不被发现。他们终将陷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中,走向灭亡。

另外,要加强对旧政权人员的管制。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命令前乡长、前保长等必须参加,站在会场的右角。区领导阐述革命形势和目前的任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剿灭匪特,并告诫前乡长、保长必须戴罪立功,不得再危害百姓,发现匪特应立即报告。后来李去非股匪从石瑞蒲村经石朋岭流窜到昌西石朋村时,该村前保长立即赶到颊口向政府报告,政府给他记了一功。

同时,区里的工作人员也保持高度警惕。每晚等下村的同志回区里后,我们不住在区机关内,而由陈汉吉在前带队、袁广立在后掩护,去野外露宿(经常住在凤凰岭山上或五星桥亭里)。有一天晚上,我们外出露宿,刚刚走到区机关后的菜园边,一个叫蒋桂的匪徒盯着我们,尾随而来。在微弱的月光下,队后的袁区长发现了他,一把将他逮住。碰到雨天,我们偶宿区机关内,也朝大门架设手提式机枪作为护卫。没看时间的手表,就以点香计时,大家轮流在厅堂值班。

我讲讲自己知道的剿灭李去非部土匪的经过。1949年6月上旬,李匪妄图扼杀我新生的县人民政权于摇篮中,围攻昌化县城,却被击溃。李匪继

续对抗人民政权，残害百姓，时而窜到蒲村的章家仓库抢粮，时而又到高山僻村抓人入伙。农历七月十六，孔家山的童朝金被抓，他因拒绝当土匪而惨遭杀害。李匪还扬言要“解放”昌化县城，到城里过中秋节。

上汤村的章冬夏在蒲村有亲戚，龙岗区委派其以走亲戚和收购造纸原料桑皮为名，前去石瑞一带侦察。了解到匪徒居住分散、行踪不定等情况后，县里决定由李子正县长率县大队、部分机关干部和解放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二营的指战员于9月16日傍晚到达龙岗。李县长安排队伍，以上汤村的章敦俊、章敦杰、章师孝为向导，分别从株柳的石朋岭和龙岗的杨田岭、火炉岭出发，前往石瑞乡六亩畈等处围剿。

9月17日拂晓前，三路队伍都按时到了石瑞境内。途经石朋岭的人员即向横田塍、六亩畈等村搜索前进，在天亮前直捣赵家山匪巢，活捉匪徒2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当他们回师到金村、井边村与途经杨田岭的人员汇合时，得知这一路从蒲村向金村方向包抄上来，至螺丝桥边与埋伏的散落土匪遭遇，解放军的一位战士不幸牺牲。为全歼匪徒，解放军二二三团二营营长拟发射火箭炮弹，李县长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

没有同意。三路清剿队伍奋不顾身与土匪激战，毙匪4人，余者凌乱地向深山丛林中逃去。

1949年10月到1950年，我在昌西区粮库工作，地点在颊口五星桥，我任粮库主任。整个粮库有五六个工作人员，房子是由各个村出木头建造的，现还存在。粮库主要存放稻谷和小麦，叫“中央公粮库”，供昌化全县。调出粮食则要经县领导审批，比如昌北区所需的粮食就是经县里批准，从这里出发往马啸方向运去的。

1950年春，我经陈汉吉、袁广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我的家庭成分问题，县委组织部部长通知我停止党籍。

昌西区土地改革时，我担任土改工作队的秘书，去过昌西的石朋、株柳、义干等村，协助开展工作。因为我主要做整理文件资料的工作，下村时间比较少。

1951年1—8月，我在省委党校第三期培训班学习，昌西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这段时间，我比较全面地学习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是我以往的学习所不能比的，比如，深入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但我直到这时才对它有了全面的理解。现在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分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论述,以及他强调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的观点。我还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从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等方面的关系展开论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矛盾论》突出矛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学了这些知识,我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而且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对自己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起来。

抗美援朝时,我弟弟章敦侠在学校报名参军并去了朝鲜,后来转业到江西盘古山钨矿任宣传干事。

三

1951年9月,我到昌化县委统战部工作。统战部做具体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后来由于机构合并,我调到县农业局下属的兽医站任站长。1954年2月,我开始在昌化中学从事教学工作。我教语文(是语文教研组组长),也教历史、地理。

大约在1958年春,我到颊口中学工作。当时学校还没有教室,只能借用小学教室,中学教师也只有两三人,由颊口小学校长任中学的领导,如翁

家白、盛达邦。1972年后,我先后到鱼跳中学、湍口中学工作了5年左右。1977年到白牛中学任教,直到1984年离休。

我教过的学生有很多。比如,我在昌化中学教书时,班里有个学生叫胡朋彬,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家里很困难,我利用周末时间几次翻越百丈岭去他家,动员他来上学。这个学生后到水利水电部工作,2015年夏来家里看望过我。石坦村的童观军也是昌化中学的毕业生,前年他们夫妻由区领导陪同来看望我。我在鱼跳中学担任班主任时,学生周先木在山上受伤,我把他背到鱼跳卫生院治疗。他后来参军,转业后曾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华侨和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我工作时的一些小事,学生都记在心里。

20世纪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是1982年),裘正回到离别了多年的昌化。昌化区委办公室提前给我打了电话。那天上午,他去看了青训班旧址。下午他即来我家,凌元浩、凌士贤等前青训班学员也同来相见。裘正同我谈了他离开昌化后的一些事,说中央组织部、浙江省委及有关部门对他当年在昌化的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接着,他看了我与周易、梅发写的回忆稿,并提出了修改意

见。裘正提议,即以我家平时洗衣服用的水泥板(长2米左右、宽60厘米左右)做一块墓碑,并亲自用黑漆题写了“姚世虎、王野耕、王长贵烈士之墓(姓名从左到右排列)”,落款是“原苏浙皖边区人民解放军浙西支队司令员周平敬之”。裘正在我家至下午6时左右才离开。墓碑立在春风岭脚山核桃林中,每年春节、清明我都要去扫墓。因日晒雨淋,现碑文字迹已不清晰。

1984年,原皖南游击队的领导证实了浙西支队与他们的关系,肯定了浙西支队为昌化解放做出的贡献。纪念昌化解放50周年、60周年、70周年时,原昌化县老领导王若山、赵克吉、陈汉吉、袁广立、孙瑞庭来参加庆祝活动,有的老领导还到过我家。

解放前,我在上海读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我庆幸没被反动派抓去。大专没有读完,就回家入伍参加革命,任浙西支队文化教员。我在阵地上没有牺牲,有幸活了下来。我在青训班时的战友王野耕、姚世虎、张武同志被反动派枪杀了;王长贵、陈先财两位同志为了多缴几支敌人的步枪来武装自己的队伍,不幸被反动派抓去,被杀害在昌化接官岭上;章敦信同志牺牲在昌化县聚秀村黄泥岭阵地

上。昌化解放后,我在昌西工作。我们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在剿匪战斗中,一名野战军战士牺牲在蒲村的螺丝桥。往事历历在目。我的战友在刑场上、阵地上光荣牺牲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我离休后,应杭州市和临安县党史、县志编写部门及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邀约,提供了许多书面的革命史料。我把自己保存的烈士遗照放大存放,并制作了红军挺进师政委、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的塑像。我把《上海学生运动史》和《军旗飘飘》等书籍及临安党史、县志方面的众多资料保存在家中。

我每天看报、剪报,同时多方搜集有价值的材料,分类整理。积累了十多年的材料,这些材料放满了家中大大小小的柜子,有的无处放,便装入编织袋中。这时,我萌发了在家建一个陈列室的想法,以缅怀烈士,教育后人。2010年,我在自己的家中建了一个简陋的陈列室。此后,每年都有许多单位组织人员来参观。2015年9月,龙岗镇文化站组织小学生来参观。2017年6月,临安国贸大厦的党员和中层干部来参观。8月,市国税局青年党员来参观。我虽然有些耳背,不过身体还硬朗,陪他们走走,讲讲往事。2019年7月15日,临安城北小学一

(3)班的学生来看望我,参观我的小小陈列室。小朋友给我系上了红领巾,献上了鲜花。临走时,他们又列队向我敬礼,我高兴地回敬了他们一个军礼。

毛主席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终于在1949年成立,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极大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事业。我个人今生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事件,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英明和毛主席的伟大。现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

我从浙西支队文化教员转为地方工作人员,再转到教书育人的岗位,深刻体会到了培养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青年人的教育非常重要。俄罗斯人有个庄重的礼节,新婚夫妻首先要向烈士敬献鲜花。我愿中国人学习这样的爱国情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我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贡献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

余生不多,但愿国家后继有人,国泰民安!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五八师傅

方 芳

16岁那年,我辞别了高中的书桌,放弃了高考,被招入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临安保养车间上班。在那个年头,省属单位全民指标招工名额对我来说很有诱惑力。

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是一家拥有4万多职工的省级大企业,她宛如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浙江省域所有公路线上,临安保养车间隶属于临安中心站,跨行政区域承担着余杭、瓶窑、临安等地客货车辆的小修、二级保养、三级保养等任务。那时仅保养车间就有职工200多名,整个中心站有职工1100多人。

当年,中心站在临安小县城是一个响当当的单位。全省免费优待乘车证,夏季生啤特供等等,在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年代都是令人羡慕的。

到车间做学徒,拜师傅是第一步。

我父亲是山区邮递员,不苟言笑,很少与子女直接交流,把儿子培养成八级技工是他的梦想。据我妈妈说,为了我拜师傅的事情,父亲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最后听说是省级先进工作者楼云山做我师傅,他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楼云山,中等身材,由于汽车修理工常年负重下蹲,形成了职业罗圈腿。楼师傅从部队退伍回来就一直在做修理工,住在票房楼上,单位就是他的家,司机叫他修车随叫随到,因为吃住行都在车间一个点上,年纪很大才成婚,工友们戏称他“司令”。拜“司令”为师,我父母都是很放心的。

修理工的活很苦,夏天做发动机时,热浪闷得头上直冒汗,一不小心,排气管就会烫伤手臂。冬天做底盘时,榔头一敲,细小的砂石直往眼睛、脖子、衣领里钻。

跟先进做学徒是更辛苦一点的,平时起早贪黑,稍空一点,师傅就总是带着我去车间的墙头四角排水沟里去掏螺丝钉。排水沟里黑乎乎地飘着一层油污,看不清下面是什么。窄沟又用不上工具,师傅就撸起袖子往下掏,然后洗净分类再送到材料间。师傅对我说,你别小看这一颗颗滚落的螺丝钉,如果我们不去掏出来被水冲走了,单位就损失大了。

就这样,他每个月都能掏好几篓螺丝送回材料间。

有一次,师傅带我检查汽车油路,拆了汽油泵后他教我说,用舌头吊一下。吊一下的意思就是用嘴去吸,如果舌头被吸住了,说明油泵好,不漏油,有真空吸力。

我说:“师傅,汽油含铅有毒。”

师傅转过黝黑的脸孔,鼓起两个眼睛瞪着我,半晌才说出话来:“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要拿下大油田,用舌头吊下油泵又怎么了?”

他回过身,用胡子拉茬的嘴吸油泵咀……

这时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我师傅是“五八师傅”。

“五八师傅”是指1958年为扩大公路支线运输量,浙江从全省各地招录的大量青年工人,将他们充实到运输一线。在这些“五八师傅”的世界观中有视企业如命的真情,也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豪情。

像楼云山师傅一样的“五八师傅”,还有很多很多,有个开客车的“五八师傅”,他总是将驾驶的客车里里外

外擦得干干净净,比自己家客厅还要光亮,车内备有晕车片、清凉油等各种物品,为了让乘客喝上热水,他把家里的热水瓶都搬到了车上。

寒往暑来,流光易逝,若干年后许多“五八师傅”蓄已奉公,积劳成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从不为生命的长度而感到懊悔,早把自己生命和企业集体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我师傅就是在他60岁那年被肺癌夺走生命的。

1988年12月20日,浙江省交通管理体制下放地方,“五八师傅”也散落到全省各地,至今已经所剩无几。

“五八师傅”的荣耀称号,随着企业解体雨霁虹销远。但他们那种忠诚、敬业、耿直的性格令我终生难忘。在车间里与他们一起摸爬滚打了八年,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好的启蒙老师。

(作者为原省汽运公司临安中心站文书)



向故乡

杨菊三

故乡终究是温馨的。

那里的山不会有多高,水也不会有多阔,但有自己的情愫,总会深深地拴住游子的心。

那里有从小看着它长大的树呀,那里有自幼翻读过无数遍的草呀。吃着它喂养的五谷,闻着它飘荡的花香,那就是一个印记,那就是一种铭刻啊!

故乡有同种共族的兄弟姐妹,有和蔼可敬的父老乡亲,有从小一起玩乐嬉戏的玩伴,还有眼睛会说话的邻家小妹。

在故乡听得到鸡鸭牛羊的多重合唱,看得到田畝中的稻浪滚滚,屋檐上的炊烟袅袅。

一切的一切都是故乡亲,一切的一切都蕴着故乡情……

在山道上行走

走在山道上,也就走在了故乡的温馨里。

山道总是弯弯的。但不管有多绕,多陡,总会在万千险象中绝处逢生。

它是顺着山势而蔓延的,它是瞄着峰尖而伸展的。不需要你喝彩,而是需要你扶携;不需要你赞美,而是需要你助力。

尽管它缠绵、悱恻;尽管它牵肠、挂肚,但它有坚忍不拔的勇气呀。它无视悬崖的险逼,云峰的高峻;它冷眼层峦的起哄,极地的横蛮,总会以最强的意志穿越,尽最大的努力登攀。

山道虽长,自有明确的方向;山道虽峭,自有闯关的能耐。在山道上转悠,虽然腿脚有点儿酸,腰骨有点儿胀,还会有点儿气喘吁吁,但终究能够走进一片新的天地……

田野里,旧貌换了新颜

弯腰割稻、弓背插秧的那种日子已如远去的黄鹤。

一切都由机械化说了算。你看看它的效率有多高啊!机声响处,满畝的金黄就齐齐挨挨地倒下了一大片;而不要半个时辰,绿禾就潇潇洒洒地站起了半个天地。

年轻的叔叔婶婶都说好,豁了牙的爷爷奶奶都说快,而手握方向盘的

邻家小妹却如一只高傲的蓝孔雀：我这一下手，每天也得收、种几百亩呢！

叔叔婶婶们见了，乐得合不拢嘴：这下可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毒日下烤了；爷爷奶奶在一旁捶着背：可不是，我们的腰腿至今还酸痛着呢！他们都说，要不是这些铁家伙来解围，说不定今天我们还在田头受罪呢。

田野里，旧貌即刻换了新颜……

常在山野走，大山的脾性了如指掌

生长在山里，翻岭爬坡这是生活的一种常态。

小时候就练就了一副铁脚板，身手敏捷如猿猴，攀悬崖，过险道，那更是家常便饭。

需要到山上去捡拾柴薪，需要到山上去采摘野果，需要到山岗山坳觅珍宝，需要将山货山产运回家。大山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需要去亲近，需要去打理。

常在山野走，大山的脾性了如指掌；常在山径行，迟钝的腿脚健步如飞。

记得清哪棵笋在哪个时段拔节，掂得准哪树杨梅在哪个时刻甜润；春烂漫不会迷乱我们的双眼，秋风寒不会困住我们的手脚。

小时候开始，我们就在大山里转悠，心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装进了这

座山！

路边有一棵大树

这棵三角枫已经在乡道边站了一千多年了，而今依然青枝绿叶，轩昂挺拔。

离村子隔着一条河，与集镇连着一根筋，却是村民的最爱，夏天的最为出彩。

携一身葱翠，泻满地清凉。路人走过，都会驻足歇上一会，村人则会围着树桩，或坐，或躺，谈天说地。

这是一棵有抱负的树。历经了田野的流风，把摸了山水的气韵，天南海北的闲扯，家长里短的谈笑，都是它的素材；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树。吸纳了行人的智慧，集中了村人的聪颖，时序的更替，朝代的变换，都是它的情节。

烈日之下，它就是一柄遮阳的硕大扇伞；风雨之中，它就是一位护犊的慈祥老人！

山不转水也没转

山不转水也没转。

几十年过去了，层峦还是那个层峦，河道还是那个河道，要说改变的，是我那一头华发，取代了那个懵懂少年。

野山笋出了一桩又一桩，你理会过了吗？一个人只有到老了才会数着

岁月过日子；野山果采了一轮又一轮，你算计过了吗？一个人只有心里清空了的时候，才会唠叨着那些不着边际的陈年旧事。

山道还是那么的逼仄，丛林还是那么的幽深，松鼠还是那么的顽皮，从这根枝上跳到那根枝上；青鸟还是那么的自在，从这个山壁飞到那个山壁。

故乡如同一根线，拴住了我的腿脚，我的思维；故乡就是一张网，网住了我的人生，我的梦想。

这山，这水，这人，烙着我太多的记忆，至今没齿不忘！

爷爷陶醉在丰收的金波银浪之中

稻熟之时，爷爷的脚头更勤了。

田野就是一个拼搏过的战场，此刻则悄无声息。有风从远方吹来，滚滚涛涛的稻浪随之起舞弄影，那种欢快，那种欣喜，不知是不是收获的一种无声表述？

此刻的爷爷已经融身于水稻深处。金黄的谷穗簇拥着他，他吻吻这谷，摸摸那穗，一如在抚爱着自己的玄孙玄女，那种情感，无以言表。

是呀，一粒谷子的成长，注入了他多少心血呀！这个捏了一辈子锄头柄的庄稼老把式，一年四季都在陌上耕

耘，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肩上的重担压弯了腰背，手中的犁把挫伤了他的手掌，而今终于迎来了稻熟谷黄，怎不让人百感交集，感慨连连！

他悠在田野里，看着眼前的金波银浪，久久地陶醉在天地之上……

乡村民宿

将蓑衣笠帽挂起来，将磨盘石臼搬出来，还有那有点发黄的木碗木瓢，有些古旧的笕箕竹篮，悉数将它们展示在现代民宿的最高端。

这是一种农耕文化的晾晒呀，这是一种艰涩生活的回味呀，让你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而今的民宿也还是岁月的复制，依然是木板房，泥坯墙，依然是大格局，小门窗，延续着当年的香火，承载着历史，蕴藏着记忆，辑录着变迁。

住一宿，那是一种回归，乡村的风物满可以在农家的屋里煮一煮，品一品；住一宿，那是一种体验，儿时的情愫满可以在这里回一回炉，加一加码。

在乡村，民宿绝对的接地气，绝对的有底气！

（作者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西湖的表情

陈 一

—

杭州的盛名,一半得自于西湖。

千百年了,西湖,犹如沉睡的西施,恬然而卧。

西湖的资质、性情是委婉、柔美、平静的。苏堤春晓,断桥残雪,季节的变幻令西湖美不胜收。这不,那浅黛可爱的群山,那烟霭迷离的柔波,正契合了那些因快节奏生活而浮躁焦虑的心情。我们在生活流中沉浮着,身不由己,内心却渴望着一种真正的平静。于是,我们选择了西湖,仿佛只有她,才能抚平心灵深处的微澜,让我们如同回归故园,心静如水。

西湖,她宽容地沉默着,接纳了所有的人。她以那种“平静”的气质,注视着湖边一切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荣辱。但西湖,更有其倔强刚烈的一面,不必说,湖边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章太炎等爱国男儿,更有秋瑾、白娘子、李慧娘这样柔中带刚的血性女子。其实,历史就在西湖那些湖山绿树中。

在这泓碧水的深处,有远古时期那一次次的潮涨潮落,有历代文人骚客吟诵不绝的无边风月。

多情的西湖,浪漫的西湖,演绎了多少人间悲欢!长长的断桥上,是否遗落了许仙与白娘子相爱的残梦?是否还有古人留连的足迹?这不,在那个暗香浮动的月夜,是苏东坡在饮酒赋诗,抑或是白居易在踏雪寻梅?星光熠熠,银河迢迢,历史的天空闪烁着几颗灿烂的星星。那些稍纵即逝的流星,可曾料想,自己的名字在千百年后,居然也会构成今天西湖的景致!

千百年来,歌山颂水,吟风弄月,把西湖的秀逸风姿唱得名扬四海的,主要还是历代文人。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这吟唱西湖的文人大军中,西子湖镌刻着两个不朽的名字:白居易和苏轼。这两位唐宋大文学家,在西湖留下了浚湖筑堤的政绩,也留下了千秋不泯的诗句。他们笔下流淌的诗文,千百年来不知给西湖增添多少秀色?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这是白居易在《春题湖上》深情的

吟唱。

与杭州感情甚笃的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刺史十余年后，在67岁时还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其中第二首是：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的咏西湖诗最丰，不止一次地吐露他与西湖的终生之恋。

其后，苏轼甚至把自然界的西湖喻为越中美女西施，以一曲短短二十八字的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叫响了一个从此流传于世的美丽名字——西子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月，钱塘夜，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深远的灵感渊藪。

来自西洋的老外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来到杭州，来到西湖使他疑入仙境，大开眼界。他觉得已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记述杭州之美，唯有惊呼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二

杭州四季，风光各异；西湖十景，目不暇接。无怪乎自隋唐开发西湖以来，多少历史舞台上的过客，都从四面八方赶到西湖来览胜寻梦。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圣杜甫的名句，不时唤起我对西湖皎皎月华的思恋。

那年金秋，我考入了杭州的一所大学。我在杭州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在西子湖畔留下了最难忘的青春年华。我又是从这里出发，兴奋地哼着流行一时的《潇洒走一回》的流行歌曲，与同学们心怀憧憬踏上了人生之旅。

那时，一遇周末，我们就泡在湖边。西湖边的画廊、印社、书店，都留下了我们年少的足迹。那些虽贫穷却温馨的时光，是如此美好！

偌大的一个城市，注入了这么大一泊水，也就让杭城沾了不少灵气。有位学者游览了西湖后曾动情地说：“西湖是自然、古典美的象征，我恨不得在湖边上走着的人都穿上古代的装束，这样才和谐啊。”尽管这种想法有些怪异，却让我生出无边的想象与感动。

让我们感到自豪与慰藉的是西湖那散发出的绵延不绝的文化气息。走在湖边的南山路上，享受着数千年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积淀给这座古城带来的繁华与辉煌。一路的画廊，一路的茶肆，以及那古朴典雅的高等学府中国美院，青砖黑瓦的文学殿堂省作家协会。走在环湖的路上，所见的每

一块砖,每一堵墙,都留有历史的遗韵,闪现着民族文化的光彩。我特别喜欢潘天寿纪念馆那种硬朗、明快、大气的建筑风格,凝重中透出质朴的审美意趣;我特别喜欢听湖畔悠扬的琴声与委婉清丽的越剧,那极抒情的唱腔是西湖船娘划波时的桨声,是湖上的涟漪在黄昏的风中慢慢开放,是江南的黄梅季节绵绵的梅雨淅沥。

不知怎的,面对西湖,我的心底竟泛起一丝淡淡的哀愁,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此生注定有许多解不开的情结。我不明白,一旦离开西湖,心底为何有游子离家时的伤痛。我真的恋恋于西湖那种柔美、古典的气质。能与西湖为伴,实在是做人之福、生命之缘。

杭州之美,美在云峰独秀,烟水无穷;天城四季皆成诗,西湖十景都是画。历代文人墨客在西湖留下了不少盛赞湖山的传世之作,让后人多自愧不如。

是呵,对西湖的赞美之词,已如同钱江潮水那样溢出堤岸。前辈已吟得太多,写得太美了,我等无名之辈,即使久居西湖,又何处去寻生花妙笔呢?

三

的确,西湖是一颗永远散发着无穷魅力的熠熠闪光的明珠!她有时是一首优美抒情的绝句,有时却是一章

气势恢弘的排律;她有时是一阙音律悠扬的小夜曲,有时却是一部雄姿壮彩的交响乐;她有时是一尺清供小品,有时却是一轴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她的美,她的趣,既源于远古至今大自然对杭州的特意垂青,又源于千百年来仁人志士、骚人墨客对杭州刻骨铭心的依恋。正是这两者完美和谐、天衣无缝的结合,才使西子姑娘的一步一趋、一颦一笑,无不散发出其独特的美!

无论是六桥花柳,还是三竺云岚;无论是灵隐古刹,还是岳王祠庙;无论是汨汨清泉,还是巍巍宝塔;无论是龙井的茶韵,还是曲院的荷香;无论是飞来峰的造像,还是岁寒岩的碑刻;无论是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的湖畔杖履,还是北山街、杨公堤、文澜阁的历史呼唤;无论是西冷印社,还是胡庆余堂……杖藜行歌,湖中寻幽,无不触发了我们的灵感。

是的,西湖的四季,总让人目眩神迷。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

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

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

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今天的杭州，文明春风扑面而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

西湖从历史走来，又从容地走向明天。今天，亚运的圣火，终于在西子湖畔熊熊燃起，把美好的祝福点燃，那是对人类的理解和尊重，对生命的力和美的赞美！

新西湖又向世人展示出她那迷人的风姿。恢复起来的极具明代特征的杨公堤，以及杨公堤上的“里六桥”与苏堤遥相呼应；西湖环线青石铺路的古韵，以及矗立着的雷锋塔，无时无刻不让我们感受到新西湖那醉人的美。我们希望她在更美的同时，保持着“平静”的特征，因为我们在许多其它领域已失去了这一特征。西湖无言，她相信，历经岁月的沧桑与风霜雨雪的洗礼，留下的是未来西湖更美的景致。

（作者系临安区文联干部）

清廉家风代代传

应拥军

黑色的天空布满了点点生辉的星星，格外耀眼。月亮高挂在空中，皎洁的月光洒下来，照在地上，给大地涂上了银辉；映在河面，像洒上一层碎银，晶亮闪光。

我漫步在锦溪边的绿道上，晚风徐徐吹来，格外清新凉爽。走着，走着，我忽然看到弯道处的洼地里有一片片圆圆的莲叶，几朵莲花争相冒出来，它们翘首仰望斗转星移。豪放洒脱地开在那里，清清白白，落落大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见到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名句来。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看着美丽的莲花，听着虫叫蛙鸣，我回忆起了童年的往事。

记得童年夏天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喜欢坐在门前的空地上乘凉。家门前不远处是一口小池塘，莲叶挨挨挤挤，莲花朵朵。明月当空，星星闪烁，清风阵阵，花香脉脉，一切都在编织着夏夜的梦……此时，父亲总喜欢把我们叫到跟前，给我们讲一些小故事。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仅初中毕业，但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什么百家姓、

千字文、四大名著、儒家学说……不说很精通吧，但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那时，父亲给我们讲的有“扬善除恶、除暴安良”的传说，也有“铁面无私、廉洁奉公”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季文子论妾马》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文子克俭持家，执掌鲁国朝政三十多年，厉行节俭，开一代俭朴风气；开初税亩，促进鲁国的改革发展。《国语·鲁语》中载有《季文子论妾马》一文：季文子任鲁宣工、成公的国相，但家中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婢女，厩中没有喂粮食的马。仲孙它规劝说：“你是鲁国的上卿，做过两世君王的国相，你的婢女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人家可能会以为你吝啬，而且也不给国家带来光彩。”季文子说：“我也希望婢女穿丝绸，马吃粮食。然而我看到老百姓，他们的父兄吃得粗穿得差的还很多，我因此不敢那样做。别人的父兄吃得粗穿得差，而我却给婢女和马那么好的待遇，恐怕这就不是国相该做的事！况且我听说可用德行荣誉给国家增添光彩的，没有听说能用婢女和马来给国家增添

光彩的。”

每当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就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如果一个当政者贪图享受，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挥霍浪费，无疑会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正如季文子自己说的那样，爱民是其节俭的出发点。而唯有如此，才能专心政务、关注民生，以实现国家大治。”我们听了都点点头。

“那些能够洁身自好、廉政为民的人才能够深得百姓的好评和爱戴。”我颇有启发地说。

“对，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父亲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指着门前池塘里的莲花说，“莲花就是廉洁的象征，身处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不随世俗，洁身自爱。所以，我希望你们像莲花一样有一颗高贵廉洁之心，公正做事，清廉做人。”

父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那时还没有包产到户，因为父亲为人正直热情、也有点文化，所以担任生产队小队长的职务，主要负责生产小队的记分、分工等事物，虽然不是多大的官，但也很忙碌。

我记得有一次邻居张大叔拿着几个鸡蛋来到我家，对父亲说：“老应啊，最近我干活闪了腰，水泵抽水的事能不能安排在白天？”那时，因为连续一段时间干旱，需要生产队安排人手在半夜用水泵抽水灌溉农田。

父亲连忙说：“既然你腰受伤了，就在家好好休息，这事我再安排一下。不过，这鸡蛋你得拿回去。”但张大叔执意不肯，硬要把鸡蛋放在我家。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把那些鸡蛋送还给了张大叔，说这是份内之事，张大叔拗不过父亲，只好作罢。接下去几天，父亲没有安排其他人手，而是自己和张大叔换了班，他连续几天都是半夜出门，天亮才归。看着父亲一脸的疲惫，我甚是心疼。

父亲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我。如今，女儿即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常常把父亲讲的故事说给她听，要求她以公正做事、清廉做人这一准则严格要求自己，让清廉家风代代相传。

夜色更浓了，散步的人陆续回家了。在月光照耀下，那一池清水似乎更清了。是啊！水清则莲更清，水污浊而莲不随其所动。人身处社会之间，必身临各种现象与是非，心清则为人耿直，原则为首，不为任何变故所倾。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望着那朵朵莲花，我更加坚定：恪己修身，方能沉着应对；廉洁从业，方可出淤泥而不染。让清廉之花永绽于人间。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天目风俗谈》出版

7月,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王建华著的《天目风俗谈》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目,指代临安。临安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风尚习俗千姿百态、颇具特色。《天目风俗谈》系统整理了天目大地经久流传的民风民俗,涉及民风、年节习俗、生产习俗、生活习俗、饮食习俗,婚育、寿庆和丧葬习俗,

方言、民歌舞蹈和戏剧,民间信仰等8个方面,读之可使人深入了解临安的淳朴民风、耕读传统、丰饶物产以及百姓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

中国历史上有“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的传统,该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临安的地方文化研究,为打造“吴越名城·幸福临安”提供了很好的资政育人素材。



学思想 育新人 忆初心 强党性

——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7月主题党日活动

7月25日,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理论学习,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党员大会,并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此次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扎实做好经济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上还传达和学习了杭州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

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党员大会。审

议、讨论、表决了预备党员曹莹莹同志的转正事宜。曹莹莹2022年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已满一年。会上,严格按预备党员转正会议流程,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与会正式党员一致同意曹莹莹同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过政治生日,忆入党初心。过好政治生日,旨在提醒每一位党员,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前路如何变幻,都不要忘记自己来时的路,牢记党员身份和党的宗旨,要时刻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会上,6名党员讲述了自己的入党故事,分享工作感悟。已有32年党龄的方明祥同志说,这次集体过“政治生日”,再次回忆起当初申请入党并获组织批准的情景,“历历在目,心潮激荡”,他表示“将保持初心,尽自己所能,为党多做些工作。”91岁的老党员吴君华同志已经有67年的党龄,他坚定地表示,“要永远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严守党的纪律,听组织的分配。”他给我们全体党员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激励同志们不忘初心,爱岗敬业,在史志事业上作出更优成绩、更大贡献。